

2019年4月，頁1-62。

近代早期法國的遠東貿易與國家工商業發展 ——「傳教、貿易與科技考察」政策*

毛傳慧**

摘要

近代早期的海洋史研究中，法國是相對被邊緣化的歐洲國家；但藉由耶穌會士達成的中西科學、技術與文化交流卻又吸引東西方學者的高度關注。然而法國政府希望藉由傳教士的派遣，以取得對華貿易特權，同時在中國境內進行實地考察，以搜集有助於發展科學與「國家工業」和商業所需訊息的整體計畫，卻鮮有學者進行系統的探討。本文作者將此一系列相關措施稱為「傳教、貿易與科技考察」政策，並以此為主軸，檢視近代早期法國為達到全面發展國家經濟、科技與對外貿易而派遣耶穌會士來華以及所採取的一系列相關措施與結果。

關鍵字：近代早期中法交流、在華耶穌會士、法國東印度公司、輿圖繪製、法國在華調研

* 本文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縝密的審閱與提出的修改意見，以及作者在2012年4月28日假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召開的「近代歐洲文獻與遠東貿易的發展」工作坊宣讀初步研究成果時，賴建誠教授給予的建議與批評，特別是將科羅貝採取的一系列革新政策與晚清的「富國強兵」相比擬的概念之提出。在該研究的基礎上，筆者通過收藏於法國各公、私立檔案館、圖書館等機構的大量原始檔案、史料的查閱與分析研究，歷經數年而完成此文。在此特別感謝國立清華大學教學發展中心支持主軸增能計畫：「遠東貿易與近代歐洲知識體系的形成—以歐洲商業貿易文書為核心的探討」（101N2530E1/102N2530E1）的執行，以及多位法國學者的邀請與協助（限於篇幅，在此不一一列舉），讓筆者得以利用寒、暑假期間，親赴典藏機構調閱、複製檔案，獲得許多圖書館和檔案館人員的協助，並得以與相關領域的學者們切磋討論，在此一併致謝。

**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副教授。

前言

台灣的海洋史研究中，法國是相對被忽視的歐洲國家，即便是西方史學研究者，關注近代早期法國在遠東貿易的研究亦相當有限¹；然而在東西文化、科技交流史的研究中，法國—特別是十八世紀透過法國耶穌會士而進行的中西交流，卻又備受東西方學者的密切關注²。造成此現象的原因與近代早期法國與葡、西、哈布斯堡（Maison de Habsbourg, 1045-1740）³等王室的勢力角逐，並受到西、葡、英、荷等拓展海洋貿易的歐洲國家激烈的競爭，而徘徊於東印度洋海域的貿易圈之外有密切的關係⁴。近代早期的法國為了突破歐洲競爭國家的多方阻撓，一方面致力於地理知識的累積、航海技術的推進，以及海上軍事力量的建立與擴充；一方面積極推進國家農、工、商業、經濟和對外貿易的發展，終於十七世

-
- 1 少數幾位西方史家，如安姆斯（Glenn Joseph Ames, 1955-2010）和刺夫（Ronald S. Love, 1955-2008）等學者，對十七世紀法國試圖進軍亞洲貿易圈的嘗試及遭逢的阻礙，進行分析與探討（如兩位學者合編的 *Distant lands and diverse cultures: the French experience in Asia, 1600-1700*,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3）；美國南亞洲史學者費伯（Holden Furber, 1903-1993）則將法國列入其十七、十八世紀印度洋貿易激烈競爭的全面觀察中（*Rival empires of trade in the Ocean, 1600-180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6）。
 - 2 該議題的相關研究豐富，且涉及面向廣泛，包括對中國科學與技術的考察、中西的文化技術、藝術面向的交流與影響等，如 P. Huard 和 M. Wong 合撰的期刊論文“Les enquêtes françaises sur la science et la technologie chinoises au XVIII^e siècle 十八世紀法國對中國科學與技術的調查,”收入於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53 (1966), pp. 137-202)；畢梅雪（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 1934-2018），*Gravures des conquêtes de l'empereur de Chine K'ien-long au musée Guimet* 吉美博物館藏《乾隆得勝圖》（Paris: Publications du musée Guimet, 1969)；Isabelle Landry-Deron, *La preuve par la Chine. La "Description" de J.-B. Du Halde, jésuite, 1735* (Paris, Éditions de l'EHESS, 2002；許明龍譯，《請中國作證：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Catherine Jami, *The Emperor's New Mathematics. Western Learning and Imperial Authority During the Kangxi Reign (1662-172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3 本文中的法文地名、人名等專有名詞譯音將以法文發音為準，若已存在正式或約定俗成的譯音，將以後者為準。外文的書、篇名將附上中譯本翻譯，若尚未有中譯本的著述，則僅翻譯非英文的著作。
 - 4 有關近代早期法國的歷史背景及其與其他歐洲國家關係的簡述，可參考張芝聯主編，《法國通史》（瀋陽：遼寧大學，2000，特別是第五章）及劉增泉，《法國史》（臺中：五南圖書出版社，2010，第十三—十五章）。

紀下半葉擺脫財政赤字的困擾，繼而取得教皇允許派遣耶穌會士前往中國傳教的機會。1700年法國耶穌會在北京成立後，逐漸取代葡萄牙王室贊助的耶穌會士在清宮中的地位⁵，並於中國境內進行涵蓋文化、歷史、物產和手工業等諸多面向的實地考察與資料搜集，再將訊息寄送回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留下了相當豐富的文獻與史料，吸引東西方關注交流史、宗教史、科技史和歐洲殖民擴展史等領域學者的投入，出版了豐碩的研究成果。然而鮮有學者關注到法國政府希望藉由傳教士的派遣，達到建立與清廷的貿易關係與實踐在中國境內科技考察的目的，以拓展其遠東貿易和工商業發展的一系列措施，筆者將之稱為法國的「傳教、貿易、科技考察」政策⁶。

事實上，法國開拓海洋貿易的嘗試，早在國王亨利四世（Henri IV，1589-1610在位）執政期間即已展開：多位出身位於法國西北部的諾曼第（Normandie）和布列塔尼（Bretagne）半島的航海家，帶領船隊向東航行尋找前往印度洋貿易圈的航海途徑⁷。然而，以「教廷長女」（la fille aînée de l'Église）自居的法國若想進入獲利豐

5 耶穌會成立於1534年，宗教改革風潮興起的時期。1540年經教皇批准後，成為正式修會，由經教皇堅證的大神父（Père général）指定的教區主教（supérieur provincial）統籌管理依地理位置劃分的各省分會，如法國分省（province de France）、中國分省（province de Chine）等，指派各分省的會長。早期使華耶穌會由葡萄牙王室贊助，雖然成員來自歐洲各國，仍統稱為「葡萄牙耶穌會士」；之後由法國王室資助，因稱為「法國耶穌會士」以與前者區分。法國耶穌會士抵達北京時，宮中尚有多位葡萄牙傳教士，因立場不同而形成對立的兩個集團；二者衝突的白熱化甚至促使康熙皇帝親自下令，「命相處為安，如一身一家」閻宗臨，〈清初葡法西士之內訌〉，《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頁176-180。有關利瑪竇創立北京耶穌會的歷史見載於大量文獻中，詳細介紹可參閱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據河北獻縣天主堂1931年版影印），（上海：上海書局，1989），卷三，頁113-138；Louis Pfister (1833-1891),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6, pp. 22-42（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入華耶穌會士列傳》，臺灣商務印書館，1960，頁41-56）。

6 除了中國對歐洲的影響以外，透過耶穌會士以及部分中國士人和清初皇帝對歐洲科學、技術和藝術的喜愛，促成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以及中西間的文化、科學、技術、藝術、醫學等各方面的交流，亦吸引許多當代學者的注意，留下豐富的學術成果，在此不一一贅述。

7 如布列塔尼半島拉瓦勒（Laval）市的航海家皮哈河（François Pyrard de Laval, ca 1578-ca 1623）和諾曼第海商波里爾（Augustin de Beaulieu, 1589-1637）於十七世紀初分別出發前往東印度洋的航行，並留下珍貴的遊記。皮哈河的遊記：*Du voyage de François Pyrard de Laval* 拉瓦勒的方索·皮哈河遊記（Paris: chez Samuel Thiboust et Veuve Remy Dalin, 3rd ed., 1619）被公認為書寫真實、且具有參考價值的記載，之後的兩個世紀間曾多次再版，並被翻譯為英文；波里爾的遊記經著名的法國東南亞史學家 Denys Lombard（1938-1998）撰寫導言和作者生平、作註後出版（*Mémoire d'un voyage aux Indes Orientales, 1619-1622*, Introduction,

厚、但競爭激烈的遠東海域，則必須獲得在教皇調停下分享東、西半球主權的葡、西兩國的許可。十六世紀末快速崛起，並迅速取得東印度洋貿易主導權的新教國家—英國和低地國（Pays-bas，即荷蘭），又因法國在歐陸的擴張政策和宗教立場而長期處於敵對的局面⁸。此外，早期法國的造船和航海技術落後，且缺乏海洋貿易所需的龐大資本，若欲遠渡重洋、與歐洲海洋國家爭勝，進而在印度洋貿易圈佔有一席之地，則須充實自身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以與之相抗衡，並抵禦印度洋區域各王國武裝船隊的襲擊。除了詳細正確的地理知識、優越的航海技術和強大的武裝船隊之外，法蘭西尚需在印度洋海域建立據點和貿易網絡，以俾取得香料、絲綢、印花棉布等利潤豐厚的商品。此外，法國亟需藉由國家財政、農工商業等各方面的明顯提升與發展，以提供海洋貿易所需的充裕財力後盾，以及得以取代貴金屬作為海外貿易的交換商品⁹。發展國家農、工、商業、促進對外貿易，成為法國近代早期多位國王的主要努力目標之一。

1685年，在羅馬教廷的認可下，太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43-1715在位）派遣被其封為「國王的數學家」（mathématicien du roi）的傳教士來華。這些耶穌會士在宣傳教義、勸誘外教人士皈依天主的使命外，還負有建立中法貿易關係，以及趁傳教之便在中國進行實地觀察的任務。在此之後的一個多世紀中，法國耶穌會士扮演清廷和法蘭西王室直接交流的橋樑，同時親身在中國進行細緻的觀察，並蒐集大量的資料寄送回歐洲，經出版、翻譯、轉譯流傳，受到當時歐

notes et bibliographie de Denys Lombard 1619 至 1622 年間東印度旅行回憶錄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Maisonneuve & Larose, 1996) 在前言中，編著者對波里爾的背景和此次航行的過程與意義，做了精要的闡述與說明。

8 由神聖羅馬帝國的內戰擴大蔓延成歐洲大規模戰役的三十年戰爭（guerre de Trente Ans, 1618-1648），原為天主教與新教的抗爭，信奉天主教的法國王室為了與哈布斯堡家族抗衡，支持新教的英國和荷蘭。然而後者並未因此而與法國形成聯合戰線，為了維持歐洲勢力的均衡，英、荷兩國與法蘭西在歐洲本土和海外不斷有戰事發生。法國在對抗英國的七年戰爭（Guerre de Sept Ans）中失利，因此喪失其位於美洲絕大部分的殖民地和位於東印度洋的據點，明顯削弱法國在遠東的勢力與影響。

9 貴金屬的交換在近代早期歐洲對遠東貿易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可參考賈永吉（Michel Cartier, 1934-2019），“Les relations franco-chinoises et la place de la soie dans le commerce des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中法關係與絲綢在十七、十八世紀貿易的地位,” in Mau Chuan-hui, Pierre-Étienne Will, *Missions au pays de la soie: l'ambassade Lagrené en Chine (1843-1846) entre science, commerce et diplomatie* 出使絲綢之國——科學、商業與外交之間的拉萼尼使團 (Paris: Ed. Collège de France, coll. IHEC, 2018), pp. 43-58。

洲人士的關注而掀起「中國熱」(la chinoiserie)的風潮。然而近代早期的法國為何不惜花費鉅資，派遣人員遠渡重洋到中國進行實地考察，並希望藉此與清廷建立貿易關係呢？法國耶穌會士的在華活動是否完成法國政府所託任務，在中國蒐集法國農工商業發展所需的資料與訊息，達到預期擴展遠東貿易和發展科學、手工業與藝術的目標呢？

筆者在研究近代中法間蠶桑絲織技術、裝飾圖案交流和貿易時，注意到耶穌會士的派遣與太陽王內政大臣科羅貝(Jean-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的「富國強兵」政策間密切的關係¹⁰，其中包含法國的農業發展和「國家工業」(industrie d'état)的建立，以及發展對外貿易的「東印度公司」之創建¹¹。美國經濟史家梅瑞克(Lewis Adams Maverick, 1891-1973)在其論文*China a Model for Europe*中指出¹²，大航海早期有關中國的描述、儒家典籍的翻譯及其在歐洲的出版，曾廣泛引起歐洲貴族、神職人員和學者們對中國歷史、政治、思想等各方面的密切關注與推崇，促使路易十四的告解神父拉雪茲(François d'Aix de la Chaise, 1624-1709)和德國學者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 1646-1716)¹³等人勸請路易十四趁葡萄牙王室無力繼續贊助的契機，派遣法國耶穌會士到中國。美國史學家安姆斯(Glenn Ames, 1955-2010)在其研究中指出：1664至1674年間，科羅貝運用法國在歐洲本土的軍事、外交策略，試圖聯合葡、英以抵制荷蘭在東印度洋的強大勢力，是確定法國在印度洋勢力建立的關鍵時期¹⁴。而此時期恰是科羅貝為提升法

10 筆者2002年在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以下簡稱法國社科院, EHESS)提出的尚未出版的博士論文“L'industrie de la soie en France et en Chine de la fin du XVIII^e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échanges technologiques, stylistiques et commerciaux 十八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法國和中國的蠶桑絲綢業: 技術、裝飾風格的交流與貿易”中，對科羅貝建立「國家手工業」的努力，有初步的介紹。

11 法國為開拓東印度洋的貿易，曾成立多個官方和私人的遠洋貿易公司，直到1664年才有正式以《東印度公司》為名的海洋貿易組織，然成立之後仍多有變遷(詳第三小節)。為行文流暢，除了針對特定商業公司的論述，均以「東印度公司」統稱之。

12 Lewis A. Ma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Texas: Paul Anderson Company, 1946)。該著述包含兩部分：十七、十八世紀歐洲人所推崇的中國經濟和政治，以及魁奈(François Quesnay, 1694-1774)的*Le dépotisme de la Chine*(中國的專制制度)的英譯。

13 近代早期德國學者，在科學、數學、哲學、語言學等多個領域均有出色的表現，同時也是外交官和藏書家，1672-1676年間為駐法大使。

14 安姆斯使用荷、英、葡、法等多種語文的檔案、史料，從不同國家的立場和論述，對科羅貝的「亞洲政策」進行分析，並探討其成果和影響。Glenn Ames, “Colbert's Indian Ocean

國的知識與文藝品質、發展國家農工商業，拓展海外貿易而建立一系列機構：如東印度公司、科學院、天文台等，的重要階段（詳下文）。這些建置在使華耶穌會士的派遣與日後的書信往來，以及與清廷的交流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將考察具有向中國傳教、建立中法貿易關係，以及在華實地考察、蒐集法國農工商業發展所需訊息的法國傳教士派遣的緣起，及其持續一個多世紀的活動，並將之置於法國近代早期欲強大國力、發展農工商業與海外貿易的背景之下進行檢視，關注與法國遠東貿易息息相關的東印度公司之成立與興衰，從法國傳教、貿易、科技考察策略的視角，檢視天主教在歐洲影響力的消長及其策略對在華耶穌會士活動的影響，以觀察近代早期法國在發展國家農工商業、拓展東印度洋貿易的一系列措施及其成果與影響。

由於清初疆土未定前曾施行海禁，康熙開海後，承繼明代朝貢貿易的模式，僅開放廣州等少數對外貿易的商港，在行商的中介下於特定的地區與季節內進行交易¹⁵，而為數有限的中文史料記載中，又多將法蘭西與葡萄牙混淆，因此本文的完成主要藉助法文史料。筆者在史料蒐集和檔案查閱時，發現法國的相關史料（如檔案、書信、契約等文字資料，和絲綢、陶瓷、動植物種子與標本等商品和文物等）散見於許多不同行政層級的公、私立檔案館、圖書館和博物館，有異於同時期英、荷東印度公司檔案相對集中保存的狀況¹⁶。此現象不但反映近代早期法國對東方的嚮往與參與人員的多元，同時也顯示法國王室對「東向」政策的全面掌

Strategy of 1664-1674: A Reappraisal,”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6:3 (1990), pp. 536-559.

- 15 受到季風和潮流的影響，在大航海時期，歐洲大帆船借助夏季的西南季風進入東南亞和南亞的海域，再於冬季東北季風南下時，隨著季風與潮流返回歐洲。五口通商以前，外國商船須於冬季來臨時離開廣州港，部分歐洲海商在此期間於是滯留在葡萄牙暫借的澳門。有關廣州行商的研究頗豐，可參考梁嘉彬的經典之作《廣東十三行考》（上海：上海書店，1989）；W. E. Cheong, *The Hong Merchants of Canton* (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7); Kuo-tung Chen, *The Insolvency of the Chinese Merchants, 1760-1843* (Ph.D. thesi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90) 以及范岱克 (Paul Van Dyke) 使用歐洲國家各東印度公司檔案完成的專著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Politics and Strategies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Trad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 16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現今集中於大英圖書館的印度事務部 (India office)，部分數位化檔案可在其網站上查詢 (<https://www.bl.uk/subjects/south-asia>)；荷蘭的相關檔案則集中於海牙的國立總文書官，部分有關台灣的檔案已經翻譯成中文，如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臺南：臺南市政府，1999-2010）、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臺北：聯經出版社，2000）等。

握，可視為「開明專制」(dépotisme éclairé)的反射。然而，隨著參與遠東政策諸多機構在近代法國政治制度的沿革和國家政策的轉變而有所調整，相關史料的典藏地點亦隨之更動。因此文中對史料的蒐藏狀況和相關機構的沿革將進行簡略的介紹，或在註腳中進行說明。希望透過本研究對於相關史料文獻收藏沿革的介紹，勾勒出法國相關機構建置的演變與政策的轉變、施行的同時，也提供讀者——特別是初入該領域的研究生——相關知識背景和檔案史料的訊息，並引導其關注歷史演變與史料典藏狀況間的密切關係。

一、史料的整理與研究

與本文相關的主要研究史料集中於耶穌會士的派遣，以及為開展遠東貿易而設置的東印度公司之沿革與演變等兩個面向。路易十四之所以決定贊助訪華耶穌會士，以及法國耶穌會士在十八世紀「中國禮儀之爭」(Querelle des Rites Chinoises)越演越烈的困境中，仍繼續堅持在華的傳教與考察活動，與康熙皇帝對數學和輿圖繪製等歐洲科學技術的愛好與需要，以及法國政府對於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科學與技術各方面訊息的需求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詳下文)。

為滿足康熙帝的要求，法國使華耶穌會士的挑選以具有數學、天文學、植物學，或建築、繪畫、藝術等科學、技術與藝術專長的菁英為首要條件，其中多位更為科學院院士或通訊員¹⁷。使華耶穌會士肩負著宣傳教義、建立中法貿易，以及在中國進行大量的觀察和資料的蒐集等多重任務。從第一批國王的數學家的選派開始，即與法國政府、科學院院士以及對中國歷史、文化、政治、制度、科學、技藝等各領域感興趣的開明人士(hommes éclairés)有所連繫，並保持密切的書信往來。使華耶穌會士根據相關人士提出的問題與要求，進行實地

17 例如：1722年抵京的宋君榮(Antoine Gaubile, 1689-1759)和1740年抵達中國的湯執中(Pierre Noël Le Chéron d'Incarville, 1706-1757)於1750年被授予巴黎科學院通訊員(Correspondant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Paris)的頭銜(Joseph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1552至1800年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Paris: Letouzey & Ané, 1973, p. 106; p. 129)。

考察與資料蒐集，並藉由書信和報告傳遞訊息，這些史料見藏於法蘭西學會圖書館（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 France）¹⁸、法國國家圖書館西方手稿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la France, département manuscrits occidentaux）、巴黎天文台檔案館（Archives de l'Observatoire de Paris）和科學院檔案館（Archiv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¹⁹等機構。隸屬於耶穌會法國行省的使華耶穌會士與教廷亦保持密切的文書往來，定期提出年度報告，並將報告全文或摘錄部分出版²⁰。

1696年，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出版的《中國近事報導》（*Nouveau mémoire sur l'état present de la Chine*）即延續耶穌會士撰寫《年度報告》，並將傳教士書信或報告的全文或節選內容出版的傳統，同時也回應了法國政府、科學院院士和開明人士的期待。《中國近事報導》問世後，獲得極熱烈的迴響，次年即出現再版，並迅速被翻譯成英文出版。1698年荷文版出版的同時，也出現了法文版的第三版；德文版則於1699至1700年間出版。1700年索邦大學神學院（La faculté de Théologie de la Sorbonne）查禁該書之前，已在歐洲廣為流傳。十八世紀初，駐巴黎的耶穌會士高必昂（Charles Le Gobien, 1652-1708）將在華傳教士寄回法國的書信和報告進行編輯出版，是為《耶穌會士書簡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de Chine,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mémoires de la Chine*，簡稱《書簡集》）²¹。透過遠赴東方宣傳教義的耶穌會士

18 法蘭西學會圖書館是根據1795年10月25日公立學校組織管理法令建立的機構，位於塞納河口，孔遜碼頭（Quai de Conti）左岸，內有成立於1635年的法蘭西學術院（Académie française）、科學院、美術學院（Académie des beaux-arts, 1816年將繪畫與雕塑學院、音樂學院和建築學院合併後成立），以及1795年成立的道德和政治科學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19 1699至1786年間的部份法國科學院定期出版的院士報告（*Histoir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avec les mémoires de mathématiciens et de physique tirés des registres de cette Académie*, Paris），以及一些學者送到科學院的數學和科學研究並於該院議會中被宣讀的報告（*Mémoires de mathématique et de physique, présentés à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par divers savants, et lus dans ses assemblés*）均已數位化，可於科學院檔案館的網站（http://www.academie-sciences.fr/archivage_site/activite/archive/ressource.htm，2018年10月9日查詢）。

20 相關書信和文件檔案見藏於梵蒂岡機密檔案館（Archivum Secretum Vaticanum）、巴黎近郊耶穌會法國行省檔案館（Archives jésuites de la province de la France）等機構。鐘鳴旦、杜鼎克合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2）收錄了與天主教教義和中國傳統祭祀等與中國禮儀之爭的相關文獻。

21 1702年，高必昂出版的第一冊《書簡集》題名為 *Lettres de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écrites de la Chine et des Indes-Orientales* 幾位耶穌會士寫自中國和東印

的實地觀察、紀錄，將近東（Levant）、印度、中國和美洲等地區的宣教情況，以及這些地區的歷史、物產、風俗、民情、知識和技術等情況介紹給法國和歐洲人士。1708 年高必昂去世後，《書簡集》的編纂工作由駐巴黎的耶穌會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等神父接手；至 1776 年為止，共出版了 34 冊²²。從未涉足中國的杜赫德在出版了九冊近東地區耶穌會士的《書簡集》的同時，將在華耶穌會士寄回法國的書信和報告進行分類整理，出版了四大冊的《大中華帝國志》，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政治制度、經濟生產、知識技術等面向作更深入而系統的全面介紹²³。1735 年，該書在巴黎出版後，次年即出現荷蘭海牙的盜印本，有效促進該書的廣泛流傳；英文譯本亦迅速出現，並於短期內多次再版²⁴。

1774 年耶穌會在教皇詔諭解散後，由法國暨納瓦拉國王路易十六（Roi de France et de Navarre, Louis XVI, 1774-1792 在位）的國務大臣貝赫當（Henri Bertin, 1720-1792）繼續贊助北京耶穌會士的傳教和調研活動，並維持頻繁的書信往來（詳下文）。1776 年，駐北京的耶穌會士錢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 1718-1793, 1751 年到北京）和韓

度的書信，此後出版的遠方傳教士書信則更名為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幾位遠方傳教的耶穌會士書寫的有教益且令人好奇的信函，是為《耶穌會士書簡集》一系列文獻出版的開始：前八冊由高必昂編輯出版，路易·帕圖耶（Louis Patouillet, 1699-1779）等耶穌會士亦參與編輯。高必昂的生平簡介可參考 Jean Levot De Prosper, *Biographie bretonne. Recueil de notices sur tous les Bretons qui se sont fait un nom* 布列塔尼人物傳記：布列塔尼有名人士小傳集纂（Vannes: Cauderan; Paris: Dumoulin, 1857), t. II, pp. 232-233。

- 22 1814 年教皇庇七世（Pie VII）恢復耶穌會後不久，《書簡集》於 1819 年重新出版。有關中國行省的報導見於第 16 至 24 冊，中國和印度行省的報導則見於第 25 和 26 冊。二十一世紀初，沈堅、鄭德弟、呂一民等學者合作將其中有關中國的部份翻譯為中文出版：沈堅、鄭德弟、呂一民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2005）。
- 23 該書的法文標題為：*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nrichie des cartes générales et particulières de ces pays, de la carte générale et des cartes particulières du Thibet, & de la Corée, & ornée d'un grand nombre de figures & de vignettes gravées en taille douce* (Paris: J.-B. Mercier, 1735)，許明龍翻譯為《中華帝國全志》。
- 24 英譯本書名為：*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Chronological, Political and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Chinese-Tartary, Corea and Thibet*, 1741 年已出現第三版（London: J. Watts, 1741, 3rd ed.）。藍莉於 2002 年出版的博士論文（*La preuve par la Chine. La "Description" de J.-B. Du Halde, jésuite, 1735*, Paris: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中，考察杜赫德編纂使華耶穌會士寄回法國的書信與報告，對《大中華帝國志》進行系統的研究與分析，對法國耶穌會士的派遣，以及耶穌會士在華調研的之歷史背景、內容與影響，做了深入的考察與論述。參許明龍，《請中國作證：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國英 (Pierre-Martial Cibot, 1727-1780, 1758 年抵澳門)²⁵ 恢復耶穌會士書簡出版的傳統，編纂出版了第一冊的《中國回憶錄》(*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 簡稱 MCC)²⁶，獲得法國各界的高度關注：《博學報》(*Journal des savants*) 刊登了長達十頁的相關報導²⁷。榮振華 (Joseph Dehergne, 1903-1990) 在細緻考察研究後發現，《中國回憶錄》除了發表 1765 年返回北京的兩位被稱為「圖爾格的中國人」(les Chinois de Turgot) 的中國年輕教友回應內政大臣圖爾格 (Anne Robert Turgot, 1727-1781) 的問卷內容外，使用了大量先前來華耶穌會士的書信內容，但未標明原作者大名。此現象尤以韓國英最為明顯：如 1777 年出版的第二冊《中國回憶錄》(pp. 575-601) 中，韓氏刊登的有關野蠶放養技術的描述，即根據湯執中 (Pierree Noël Le Chéron d'Incarville, 1706-1757) 的報告編纂而成。然而《中國回憶錄》在編輯和書寫上雖然受到當時許多學者嚴厲的批評，但其內容豐富，且廣泛涵蓋了中國方方面面的訊息，同時也反映了當時法國政府和學者們關注的議題，該叢書的重要性不容否認。

十八世紀中葉開始，法國檔案館和學者們也陸續將有關東印度公司和法國在遠東貿易的檔案整理出版，並提供詳盡的目錄和內容簡介。東印度公司檔案室主任戴赫尼 (Dernis) 將 1664 年東印度公司正式成立以來的所有相關的詔書、公告、法令規章以及其他與東印度公司有關的書信、文件，集結成四大冊 (*Recueil ou collection des titres, edits, declarations, arets, réglemens et autres pieces concernant la companies des Indes orientales*)，於 1755 至 1756 年間出版²⁸。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數位

25 韓國英小傳，詳 Joseph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pp. 12-13.

26 《中國回憶錄》的法文標題全名為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 c.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由巴黎 Nyon 出版社出版，至 1791 年為止，共出版了 15 冊，1814 年再繼續出版第十六冊。可在 *Chine ancienne* (<https://www.chineancienne.fr/17e-18e-s/memoires-concernant-les-chinois/>) 和 *Bibliotheca sinica 2.0* (<https://www.univie.ac.at/Geschichte/China-Bibliographie/blog/2010/06/10/memoires-concernant-les-chinois/>) 等網站下載掃描的電子檔。

27 Joseph Dehergne, "Une grande collection: 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 (1776-1814)," *Bulletin d'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72 (1983), pp. 267-298.

28 在法國國家圖書館數位圖書館網站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1102726.image>) 上可下載該文獻的 pdf 檔。法國有許多檔案館均將館藏目錄上網，並提供檔案內容的介紹，讓學者可以事前查詢，對研究者—特別是遠距離、且無法長期停留在法國檔案館內進行資料蒐索的東方學者—而言，可縮短當場檢閱目錄、調閱資料的時間，提供研究上的許多方便。

漢學家高度關注法國東印度公司和耶穌會士對遠東貿易和亞洲調查的歷史，彙整出版了大量法國對華關係的史料與文書，其中以漢學家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的出版尤豐²⁹。高第早年曾旅居上海多年，並於 1872 年開始擔任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北中國分支（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圖書館員，直到 1876 年離開上海才終止。這些經歷讓高第得以建立廣闊的學術網絡，即便不諳中國語文，仍得以藉由多元的歐洲語言研究與史料，掌握中國和亞洲的歷史、文化等相關訊息。1890 年，高第與萊頓大學的漢學教授施萊格（Gustaaf Schlegel, 1840-1903）合作創立學術期刊《通報》（*T'oung Pao*），出版大量有關中國的研究和相關史料和文獻介紹，在漢學研究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883 年，高第從法國外交部檔案館（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的館藏中，挑選出法國在中國活動的相關史料，彙編出版了《十八世紀法國在中國：未出版的史料》（*La France en Chin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 documents inédits*），公開了典藏於法國國家檔案館（Archives nationales）³⁰ 和海事暨殖民地部檔案館（Archives du Département de la Marine et des Colonies）等機構中有關法國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特別是東印度、中國和交趾支那等地區——的活動、傳教士在中國時留下的紀載，以及與廣州法國使館的設置相關的檔案和報告等種種史料。作者在長達 65 頁的前言中，分析評論當時歐洲各國，如葡、西、荷、英、俄等有關東印度貿易的史料、報告與論述。

29 高第出生於美國的路易斯安那州的紐奧良（New Orlean），年幼時抵達法國，全家隨之定居巴黎，曾就讀於巴黎和英國的學校。1869 年初，高第前往上海一家英格蘭銀行工作，不久即在上海的報刊上發表文章。1876 年，接受中國政府留歐學生計畫秘書的任命返回法國，擔任此職務時，結識了當時東方語言學校（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的管理者（administrateur）薛斐（Charles Schefer, 1820-1898）。後者對高第淵博的學識非常激賞，1881 年為其創設「遠東的歷史、地理與司法」（histoire, géographie et législation de l'Extrême Orient）課程。高第的著述相當豐富，對漢學研究的貢獻厥功甚偉，編輯的 *Bibliotheca Sinica* 輯錄當時與中國相關研究的各種語文的書目和論文，是漢學研究的重要參考典籍。詳 L. Arousseau, “Henri Cordier (1849-1925),”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5(1925), pp. 285-286.

30 由於檔案數量日增，原位於巴黎第三區 Francs Bourgeois 街的舊館不敷存放，法國國家檔案館將檔案依年代分別典藏於位於巴黎市三區原有的蘇俾斯暨弘翰館（Quadrilatère de Soubise et de Rohan）、大巴黎區北部的皮耶菲特（Pierrefitte-sur-Seine）以及楓丹白露分館（近期內將搬遷至皮耶菲特）等處。舊制度的檔案仍藏於三區舊館，十九世紀及以後的檔案則收藏於皮耶菲特分館。研究者可在網上查詢收藏目錄（<http://www.archives-nationales.culture.gouv.fr/fr/web/guest/salle-des-inventaires-virtuelle>）。

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紀初，法國在失去大部分的殖民地主權之後，將管理海外殖民地的文書和相關檔案移置法國本土，海事檔案館亦將其保管的、有關海洋貿易的檔案移交法國國家檔案館保存。法國遠東貿易的相關文書於是見藏於法國國家檔案館、外交部檔案館、國家檔案館海外檔案館（Archives nationales d'Outre-Mer）、位於布列塔尼半島洛里昂（Lorient）的海防部歷史文獻中心（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和法國國家圖書館手稿部等國立機構，而對華貿易海港附近的市立圖書館、博物館，如南特市立圖書館（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de Nantes）亦收有零散的檔案，如契約等。高第對法國在華耶穌會士的活動與歷史也非常關注，1913年開始在《通報》上陸續出版了貝赫當與北京耶穌會士的書信³¹；1916年分兩期刊登了耶穌會被解散的相關史料和書信，對耶穌會的成立、法國使華耶穌會士的派遣，以及法國耶穌會士在中國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活動，做了扼要的介紹³²。此外，高第也發表了多篇有關耶穌會、耶穌會士通訊和早期中法關係建立的論文。

1928年12月開始，《博學報》分四期連續刊載了另一位重要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在交叉比對過多份手稿之後，詳細考證與勘誤後確認作者為佛芥（François Froger, 1676-1715 ?）的航行日誌³³。這份隨船記錄第一艘駛往廣州的法國東印度公司商船《阿曼菲提特》號手稿的初次問世，緣於一位名叫巴尼斯特（Saxe Bannister, 1790-1877）的英國法庭律師暨事務律師（barrister and attorney-general）在1859年出版的英文譯本³⁴。由於巴尼斯特據以翻譯的稿本上並

31 Henri Cordier, "Les correspondants de Bertin, Secrétaire d'état au XVIII^e siècle 十八世紀國務大臣貝爾當的書信," *T'oung Pao*, second séries, 14:2 (1913), pp. 227-257; 14:4 (1913), pp. 465-472; 15:3 (1914), pp. 307-338; 16:1 (1915), pp. 27-60; 16:2 (1915), pp. 229-235; 18:4/5 (1917), pp. 295-379.

32 Henri Cordier,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éking," *T'oung Pao*, second séries, 17 (1916), pp. 271-347; pp. 561-623.

33 Paul 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avec la Chine. Le Premier voyage de l'*Amphitrite* en Chine 中法關係的起源：《阿曼菲提特》號駛往中國的首航," *Journal des Savants*, Paris, décembre 1928, pp.433-451; 1929, pp.110-125; 252-267; 289-298。

34 "The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to China, in 1698, 1699, and 1670," in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to China, 1698-1700*, translated from 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by Saxe Bannister, with an essay on the friendly disposi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to foreigners (London: Thomas Cautley Newby, publisher, 1859).

未署名，以出版遠東旅行指南聞名的馬投樂 (Claudius Madrolle, 1870-1949)³⁵ 誤以為是《阿曼菲提特》號的二副塗須 (Bouvet de Touche) 留下的手稿。二十世紀初，德國一位名為佛赫茲 (E. A. Voretzsch, 1868-1965) 的駐外人員在里斯本的阿茹達 (Ajuda) 圖書館發現一份有佛芥署名的手稿，才確定該遊記作者的身分。伯希和根據佛赫茲發表於《大亞細亞》(Asia Major) 學術期刊 (1926) 的文本³⁶，進行嚴謹的考證與勘誤的工作之後發表註釋本。此外，曾在大清洋海關任職的馬士 (Hosea Ballou Morse, 1855-1934) 使用藏於大英圖書館印度事務部 (India Office) 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文書，以編年史的形式撰寫的《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6-1834》(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³⁷，其中亦涵蓋一些十七、十八世紀期間法國對華有限的商業活動。

二十世紀初期，多位法國學者以法國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活動為核心，對近代法國與中國的貿易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地理歷史研究者卡擘普蘭 (Paul Kaepelin)³⁸ 使用大量法文一手材料完成的《東印度公司與方索·馬丹》(La

35 馬投樂出生於法國北部的港市迪耶普 (Dieppe)，是一位探險家和輿圖測繪師，曾於各地旅行、進行探勘，1895 年遊歷中國華南和嶺南地區。1902 年開始任職於印度支那總督府 (cabinet du gouverneur général de l'Indochine, 1902-1907)，1907 年陞遷為該單位的副長，負責考察雲南等地的地理及繪製地圖。在其博士論文 *Les premières voyages français à la Chine: la Compagnie de la Chine, 1698-1719* 法國早期對華航行：中國公司，1698-1719 (Paris: Challamel, 1901) 中，大量引用 1698 至 1710 年間航行到中國的法國商船之航海日誌的全文或摘錄。然而馬投樂使用史料的態度不甚嚴謹，在引用其著述時須小心考證。1904 年開始，馬投樂出版了包含中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日本等地的旅行指南叢書：《馬投樂指南》(Guide Madrolle)。Numa Broc, *Dictionnaire illustré des explorateurs français du XIXe siècle. II. Asie* 十九世紀法國探險家插圖字典，第二冊：亞洲 (Paris: C.T.H.S., 1992, pp. 300-301) 有馬投樂的小傳。

36 François Froger, *Relation du premier voyage des Français à la Chine fait en 1698, 1699 et 1700 sur le vaisseau "L'amphitrite"* 1698、1699 和 1700 年間法國人搭乘《阿曼菲提特》號前往中國的首次航行紀錄 (hrsg. von E. A. Voretzsch, Leipzig, Asia Major, Leipzig, 1926), p. xvi-187.

37 馬士的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1834* 於 1926 至 1929 年間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共五冊。1991 年區宗華於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中譯本，2016 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林樹惠校訂、張文欽校注的新版本。

38 卡擘普蘭使用當時法國的殖民地檔案館 (Archives des Colonies)、國家檔案館的海事檔 (Archives de la Marine)、外交部檔案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手稿，以及諸多出版的遊記和《航海手冊》(Instructions nautiques) 完成兩部博士論文：*La 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 et François Martin: Étude sur l'histoire du commerce et des établissements français dans l'Inde sous Louis XIV (1664-1719)* (Paris: Challamel, 1908) 和 *Les Escales françaises sur la route de l'Inde (1638-1731)* 1638 至 1731 年間法國在通往印度航路的中轉站 (Paris: Challamel,

Compagnie des Indes et François Martin) 為東印度公司的創設與沿革做了細緻的研究與探討。作者在書中對相關史料文獻進行考察與分析介紹，提供初涉該領域的學者非常有用的研究指南。歷史學家戴赫密尼 (Louis Dermigny, 1916-1974) 於二十世紀中葉出版的《中國與西方：十八世紀廣東的貿易 (1719-1833)》(*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 是研究十八世紀中國對外貿易不容忽視的經典鉅著。作者利用豐富的官方和私人檔案資料，如商會檔案、貿易紀錄、書信等，進行嚴密而細緻的分析，進而建構十八世紀廣州的對外貿易情形，清晰的勾勒出一個耶穌會士和哲學家眼中的理想國度，同時又是活動於南中國的歐洲海商和旅行者筆下貪污行賄的兩極化的中國。上文提及的美國史學家安姆斯則縱覽荷、英、葡、法等歐洲檔案，以宏觀的角度探討近代早期法國在東印度洋的活動，是為數不多關注此時期法國在遠東地區勢力消長及其亞洲政策的史學著述。現任教於法國安吉大學 (Université d'Angers) 暨海事研究院 (Académie de la Marine) 成員的歐德黑 (Philippe Haudrère) 教授出版了一系列有關法國印度公司 (Compagnie des Indes) 的論述³⁹，對法國東印度公司創設的背景、源起、組織、變革、船隻的建造有詳細的探討，且對於公司設址於洛里昂之選擇與考量，有深入的考察。歐德黑教授對其他歐洲國家的東印度公司亦有全面的介紹，呈現大航海時期以來歐洲各國在遠東海洋貿易的全貌。然而作者的研究側重於法國西印度公司較為活躍的美洲和法國殖民地的貿易，以及法國在印度洋的殖民活動，對於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的商業活動著墨相對較少。

1994年，杜木蘭 (Marie-Pierre Dumoulin-Genest) 在社會科學高等學院 (以下簡稱法國社科院，EHESS) 提出的博士論文 *L'introduction et l'acclimatation des plantes chinoises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十八世紀中國植物在法國的引進與馴化 (Paris : thèse de doctorat non publiée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考察十八世紀中國植物在法國引進與馴化的途徑與過程，將焦點置於耶穌會士在中國

1908)。殖民地檔案館在法國去殖民化 (décolonisation) 的政策下，於1966年改為法國國家海外檔案館，並搬遷至法國南部普羅旺斯省的艾克斯市 (Aix-en-Provence)。

39 法國的印度公司分為主要與亞洲貿易的東印度公司 (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 和與美洲貿易的西印度公司 (Compagnie des Indes occidentales)。

進行的植物調查和研究的分析與探討。作者從植物的觀察辨識、種子的收集，以及與中國植物種植、培養、用途和使用方法訊息的獲得，進行深入而系統的研究與論述。有關法國使華耶穌會士的背景、活動內容、成果及影響，以及以耶穌會士為中介的中西間的文化、科學、技術、醫學與藝術等交流的論述與研究，成果相當豐碩，除文中提及的幾位學者外，多位中外學者，如安田樸（René Étienne, 1909-2002）、謝和耐（Jacques Gernet, 1921-2018）、徐光台、張西平、韓琦等諸多學者均提出精闢的觀點與貢獻，在此不再一一贅述。

二、「傳教、貿易、科技考察」政策的形成

中世紀以來，經穆斯林商人和意大利北部的城邦國家，如威尼斯、熱內瓦（Repubblica di Genova）、盧卡（Repubblica di Lucca）等公國，輾轉引進歐洲的來自東方的精美商品，強烈吸引著王室、貴族和富有家族的成員。眼見國內貴金屬為換取價昂的外來商品而外流，自直系卡佩王朝（Capétiens directs, 978-1328）後期開始，多位法國國王曾多次頒佈僭侈令，限制奢侈品的數量與條件、甚至完全禁止奢侈品的使用，然而始終無法杜絕漏卮，每年仍有大量的金、銀等貴金屬流出國外。此外，卡佩王朝的執政者為了鞏固王權、擴張領土，與歐陸其他國家長年交戰所需的龐大軍費，更急速地消耗國庫收入，財政赤字成為常態。

為發展國家經濟，瓦盧王朝（Maison de Valois, 1328-1589）的路易十一（Louis XI, 1461-1483 在位）積極推動法國的手工業、促進國內外貿易的發展：不但廣設驛站以方便交通運輸，更提倡印刷業、引進絲織手工業，以授予特權（*privilège*）的方式吸引外國手工藝匠前來，在其治下創立了皇家絲綢織造工場。而深受意大利文藝復興文化薰陶的方索一世（François I^{er}, 1515-1547 在位）更效法意大利梅蒂西家族（Maison de Médicis）贊助、保護藝術發展與創新的作風，以豐厚的條件吸引具有才能的藝術家和手工藝匠前來法國，對文學、藝術和手工業發展有正面的影響：日後成為法國人驕傲的蠶桑絲織手工業，即在方索一世治下奠定良好的基

礎⁴⁰。然而，經過長期的內戰之後，十六世紀末的法國重新面臨國庫空虛、經濟衰落的困境，直到 1598 年改宗天主教的新教徒國王亨利四世（Henri IV, 1589-1610 在位）頒布南特詔書（Édite de Nantes）後，才算暫時緩和了新、舊基督宗教間的衝突，重建法國社會的安定。在胡格諾信徒（Huguenot）敘利公爵（Maximilien de Béthune, duc de Sully, 1559-1641）和經濟學家拉芙瑪（Barthélemy de Laffemas, 1545-1612）的輔佐下，法國政府積極修建道路、河運，建立便利的交通網絡，並鼓勵蠶桑、絲麻紡織等農業和織品手工業生產，並推動對外貿易的發展，希望藉此重振法國的經濟和財政。1610 年亨利四世被暗殺身亡後，法國再度陷入困境。沖齡即位的路易十三（Louis XIII, 1610-1643 在位）成年後，在紅衣主教希敘里爾（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 1585-1642）⁴¹ 的輔佐下，採取削減貴族力量以鞏固王權的策略，奠定君主專政的基礎，同時敕平胡格諾教徒的對抗、安定社會。此外，尚鼓勵東印度公司的設立，嘗試效法葡、西兩國「傳教和貿易並行」的策略，以拓展遠東的海洋貿易。希敘里爾在其晚年採行在歐陸的帝國擴張政策，支持新教徒的反對勢力，以打擊哈布斯堡家族的力量；1635 年更直接捲入三十年戰爭（1618-1638）。在此戰役中，法國從神聖羅馬帝國手中取得阿爾薩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兩省的領土，奠定其歐洲霸主的地位，但也造成波旁王朝（Maison de

40 路易十一希望在里昂市（Lyon），創設絲織工場，然而，當時里昂市集由於有來自意大利的精美絲綢，為該市帶來繁榮的貿易與經濟。里昂的執政官擔心絲綢工場的設置可能引起意大利絲綢業者和商人的不滿，不再前來市集貿易，將嚴重影響該城市的富庶，因此採取消極抵制的方式，延宕資金的籌措，已經遷居里昂的意大利絲綢工匠因此無法取得酬勞，而生活窮困潦倒。路易十一只好與里昂市的執政官協調，由執政官負擔工匠和織具搬遷至王城腳下的圖爾市（Tours）的所需的費用。絲織業從此在圖爾市紮根、繁榮。十六世紀初，鑑於圖爾市絲織業的發展以及帶來的財富，1536 年，里昂的執政官請求方索一世給予同等的特權，以吸引意大利藝匠前來里昂創立桑苗園和絲織工場，對日後法國蠶桑絲織工業的奠定與發展有重要的意義。可參考筆者的博士論文“L’industrie de la soie en France et en Chine de la fin du XVIII^e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échanges technologiques, stylistiques et commerciaux”第一章“L’industrie française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十八世紀末以前法國的絲綢業”，以及 Luce Boulnois (1931-2009), *Silk Road, Monks, Warriors & Merchants on the Silk Road* (Hong Kong: Odyssey Books & Guides, 2012, 譯自法文原著 *La Route de la soie – Dieux, Guerriers et Marchands* 絲綢之路——上帝、戰士與商人 (Geneva: Éds Olizane, 2001) 第 17 章 “The Emergence of the Great Sea Powers and the Birth of the French Silk Industry”。

41 希敘里爾出生於巴黎，1616 年曾任外交部長（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1622 年被任命為紅衣主教，兩年後擔任路易十三的國務大臣（principal ministre d’État），輔佐年輕的路易十三直到 1642 年去世為止。

Bourbon, 1589-1792, 1814-1830) 財庫的空虛；法國的帝國擴張政策也引起其他歐洲國家的圍堵，使得法蘭西海商向印度洋海域的發展遭遇重重困難。經濟的發展與政治的穩定，遂成為法國政府執政的重要目標之一。

而自從 1498 年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 (Vasco Da Gama, 1460-1524) 完成從歐洲直航到印度的探險，並載回以黑胡椒為主的珍貴香料後，里斯本逐漸取代意大利北部的公國，成為印度商品在歐洲的轉口市場。葡萄牙貴族、航海家和傳教士們先後進入印度洋海域，在當地蒐集傳說中富庶且技術先進的中國之相關訊息。1508 年 2 月，塞奎拉 (Diogo Lopez de Sequeira, 1465-1530) 帶著葡萄牙王曼努一世 (Manuel I de Portugal, 1469-1521) 的指示前往馬六甲，查訪當地中國人 (Chiyns) 來自何處？在當地貿易的細節 (如商品內容、數量、船隻型式等)，以及關於中國疆域、信仰、風俗等多方面的訊息⁴²。在 1565 年西班牙人佔有菲律賓以前，葡萄牙人已出版了有關中國描述的大量遊記⁴³。多明我修會 (ordo fratrum preaedicatorum, 通稱 orden dominicana) 的傳教士克路志 (Gaspar da Cruz, c. 1520-1570) 根據自己遊歷南中國的親身經歷，以及從葡萄牙俘虜獲得的報導，對中國進行較全面的描寫，於 1569 年出版《中國志》(*Tractado em que se cõtam multo por estẽso as cousas da China*)，該書可說是現存近代早期最早出自歐洲人筆下的中國敘述⁴⁴。西班牙人佔有菲律賓後，奧斯定會 (ordo Sancti Augustini)、多明我、方濟會 (ordo fratrum minorum) 等修會的傳教士紛紛以此為據點，嘗試進入中國並建立教區。1581 年奧斯定會神父門多薩 (Juan Gonzáales de Mendoza, 1545-1618) 受教廷諭令在菲律賓蒐集有關中國的大量訊息，1585 年在羅馬出版《大中華帝國史》(*Historia delas cosas mas nontables, ritos y*

42 Donald Ferguson, *Letteres from Portuguees Captives in Canton, written in 1534-1536: With an Introduction on Portuguese Intercourse with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Nabu Public Domain Reprints, 2012, 初版:1902), p. 1 (何高濟譯,〈廣州葡囚書簡(1524?)—葡中首次交往的見證〉,《十六世紀葡萄牙文學中的中國中華帝國概述》,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69)。

43 這些敘述的部份內容引用《馬可波羅遊記》的敘事，部分內容與事實有所出入，可參考何高濟《十六世紀葡萄牙文學中的中國中華帝國概述》提供的豐富線索。

44 博克舍 (Charles Ralph Boxer) 將《中國志》與同為葡萄牙人的伯來拉撰寫的《中國報導》、西班牙拉達的《出使福建記》和《記大明的中國事情》結集成冊，題名為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53)，何高濟將之翻譯成中文：《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北京:中華書局,1990)。

costumbres)⁴⁵。這些紀錄雖未能提供有關中國經濟、社會的詳細訊息，卻已向歐洲社會昭然顯示一個具有高度文明的東方國度的存在。明末，葡萄牙耶穌會的意籍神父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承認祭祖、祭孔等儀式與天主教的相容性，同時以歐洲的輿圖、科學、技術和醫學接近明末士人，終於成功進入中國傳教，並於 1601 年在北京建立耶穌會⁴⁶，歐洲人得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國。利瑪竇去世後，金尼格 (Nicolas Trigzault, 1577-1628) 將其意大利文手稿翻譯成拉丁文，題名為《基督教遠征中國記》(*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後稱為《利瑪竇中國札記》) 於 1615 年在歐洲出版，獲得普遍好評，有法、德、西、意大利等語文的譯本問世⁴⁷。而後，曾德昭 (Álvaro Semedo, 或譯謝務祿, 1585-1658) 以西班牙文出版的《大中國志》(*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 da China*, 1642) 將明朝的富庶介紹給歐洲讀者⁴⁸。隨著更多東印度精美商品的輸入，以及介紹東印度洋繁榮貿易和中國的富庶與安逸的書籍在歐洲的出版與流傳，歐洲王室和上、中層社會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就更為熱衷與嚮往，繼而掀起對中國的狂熱與模仿⁴⁹。

法國雖然歷經多次對外戰爭和長期內戰而國庫空虛，然而在波旁王朝早期幾位國王的努力下，卻也達到了擴充疆土、統一政權、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等目標，為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國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路易十四執政初期之得以擺脫長年財政赤字的困擾，進而成為歐洲霸主，其內政大臣科羅貝的運籌帷幄功不可沒。在其輔佐、規劃下，法國在科學、技術與藝術各方面均有輝煌的成績，並帶動農、工、商業的發展，使得十八世紀的巴黎得以躍升為藝術之都，法國宮廷亦成為歐洲時尚的典範。

科羅貝出身於法國北部香檳區漢斯 (Reims) 市一個擁有大片領地的富商家

45 1587 年在倫敦亦有葡文本的印刷，次年出版英譯本 *The histories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 (translated out of Spanish by R. Parke, London: Wolfe for Edward White)。

46 Fontana, Michela, *Matteo Ricci: A Jesuit in the Ming Cour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c., 2011), ch. 13.

47 北京的耶穌會士除了將歐洲的文獻翻譯成中文和滿文，也將中文典籍翻譯成拉丁文和其他歐洲文字。1626 年金尼格在杭州將翻譯成拉丁文的五經付梓，題名為 *Pentabiblion Sinense*。

48 該書手稿完成於 1637 年，1642 年西文版問世後，陸續出版義 (1643, 1653, 1667, 1678)、法 (1645, 1667)、英 (1665)、荷 (1670) 等語文的譯本。

49 Levis A. Ma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vol. I. *China's Economy and Government admired by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 Europeans*.

族，1645 年獲引薦出任國家戰爭秘書長的私人秘書，1651 年更被推薦給路易十四的攝政大臣馬札函主教（Cardinal Mazarin, 1602-1661），以管理財物得當而獲得讚賞。1659 年，科羅貝擔任法國財政官（Intendant des Finances）負責監督國家財政時，曾試圖改革法國稅收、去除弊端以增加國庫收入；他在一份報告中指出當時的財政總管（Surintendant des finances）富珂（Nicolas Fouquet, 1615-1680, 1653-1661 財政總管）每年僅將不及 50% 的稅收金額繳入國庫。1661 年馬札函在臨終病榻前鄭重地將科羅貝推薦給年輕的路易十四，科羅貝自此逐漸取得掌管法國政治、經濟、海事、手工業和藝術等各部門的權力：1661 年出任國務大臣，1664 年被任命為掌管建築、藝術與手工業製造的皇家建築總管（Surintendant des Bâtimens royaux, Arts et Manufactures），翌年更身兼皇家財政總監督（Contrôleur général des Finances）一職。1669 年科羅貝擔任掌管國王事務省的國務大臣（Secrétaire d'État de la Maison du roi）⁵⁰ 時，將海事部（La Marine）一併納入其職權範圍內，並開始著手擴充海軍的船隊與裝備⁵¹；1661 年科羅貝初任國務大臣時，法國的海軍軍力仍非常薄弱，僅擁有的三十艘戰船，裝備了 60 至 70 門大砲的戰艦只有三艘，尚不足以防衛法國本土的海港；到了 1678 年與荷蘭簽訂終止荷法戰爭的尼梅格條約（Traité de Nimègue）時，法國海軍已擁有 120 艘戰船，其中有 12 艘是裝備了 76 至 120 門砲的一級戰艦⁵²。此外，科羅貝還投入海港的建設以提供優厚的海運條件，並訂定海員登陸和相關管理規則，種種措施均有效地提高法國角逐遠東海洋貿易的競爭力。

50 國王事務省（Maison du roi）分為管理國王生活所需的器物、禮儀、音樂等的文化部（Maison civile）、管理皇家軍隊的軍事部（Maison militaire）和安排宗教活動的宗教部（Maison ecclésiastiq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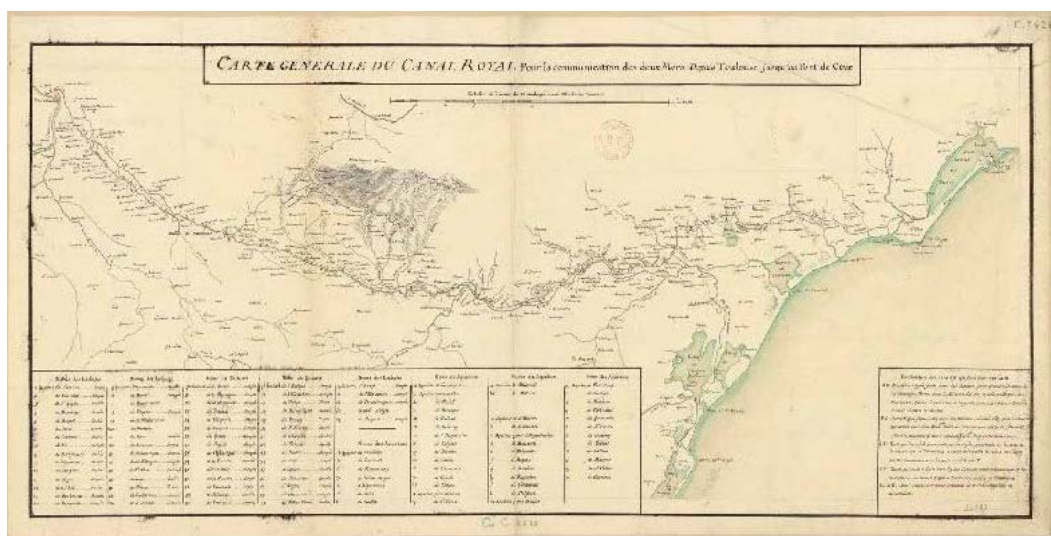
51 將國家政權集一身的科羅貝對法國政治、經濟、制度等進行全面的改革，因起用其家族成員擔任官職而受到許多負評。然而在其身後，開始有對其執政正面評估聲浪的興起，伏爾泰（Voltaire, François-Mari Arouet, 1694-1778）在《路易十四時代》（*Siècle de Louis XIV, suivi de la liste raisonnée des personnages célèbres de son temps, nouvelle édition annotée par Charles Louandre, Paris: Charpentier, 1852*）一書中即對此現象有所說明。有關科羅貝的重要建樹，可參考該書的第二十九和三十九章。然而，科羅貝的一些措施亦帶來負面的影響，例如 1667 年訂定的規則即成為里昂絲綢織造坊主（maître fabricant，類似清代絲綢業的「帳房」）和織造高手（maître ouvrier）之間長年紛爭的起源。

52 Pierre Clément, *Histoire de la vie et de l'administration de Colbert, contrôleur général des finances, ministre secrétaire d'état de la marine, des manufactures et du commerce, surintendant des bâtiments* 柯貝羅的生平及其執政：財政總監、管理海事部、製造業和商業國務卿、營造總監（Paris: Guillaumin libraire, 1846），pp. 378-379.

科羅貝在逐步掌握國家各領域大權的過程中，對法國的財政、軍事、交通、手工業、科學、藝術等各個面向逐步作了改革。財政方面，採取縮減財政開支、防止貪腐、提高賦稅等措施，擺脫法國財政長期赤字的困境，並增加王室財富；經濟方面，有計劃地發展農業、試圖建立「國家工業」，鼓勵國內、外貿易的發展，並注意交通網路的建設，連結地中海和大西洋的皇家朗格多克運河(Canal royal de Languedoc，圖一)⁵³即為最好的例子。為了支持國家工業和貿易的發展，科羅貝採取保護關稅的措施；他的一系列工業政策被稱為「科羅貝主義」(Colbertisme)，又稱「重商制度」(système mercantile)或「保護制度」(système protecteur)。在發展法國的農工商業政策中，科羅貝採取摹仿鄰國農業、手工業的策略，鼓勵原料生產、提高手工業製造技術，以期不再需要依賴進口的原料或商品。除了振興舊有的手工業以外，更從國外引進新的生產工藝，鼓勵蠶桑絲綢業、玻璃業和壁毯手工業。為此，科羅貝提供條件優越的專利權或特權以吸引具有先進技術的外國工匠前來，藉此引進優良的外國知識與技術。科羅貝創設的一系列科學、藝術機構：1663年成立碑銘暨美文學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1666年創設科學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次年建立天文台(L'Observatoire)等，對於法國科學、技術的進步與完善，以及特有藝術風格的塑造與發展均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在對外貿易方面，科羅貝繼承前幾任內政大臣發展歐亞大陸貿易、尋求通往東印度路徑的目標，積極拓展法國在東印度洋的勢力、將馬賽港塑造成一個自由港的同時，繼續加強與中東地區的貿易關係，希望藉由陸路到達中國。1669年，科羅貝創立少年語言學校(École des jeunes de langues)以培養、儲備翻譯和對外貿易的人才，確保對外的交涉工作不需要仰賴外國人的協助。最初僅教授通行歐洲和西亞的土耳其、阿拉伯、古希臘語等語言和文化；1843年，在政府的要求下，增設了口語中文的課程(chaire de chinois parlé)⁵⁴。

53 該運河於法國大革命後更名為「南運河」(Canal du Midi)。

54 「少年語言學校」經歷了長達三個多世紀的興廢和制度、規模的變革，於1971年改制為現今的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2011年搬遷至巴黎十三區。1721-1762年間，該校教師由耶穌會士擔任，1763年轉而附屬於路易大帝中學(Collège Louis-le-Grand)。法國大革命後改制為東方語言學校(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教授東方活用語言(langues vivantes，即生活中使用的語文)，授課地點在位於



圖一 a、《皇家運河全圖：為連結從土魯斯到塞特港的兩個海洋[地中海與大西洋]》(Carte générale du canal royale pour la communication des deux mers depuis Toulouse jusqu'au port de Cette, BnF, Gallica) (Cette 於 1928 年改寫為 Sète)



圖一 b、1837 年豎立於阿勒佐入水口 (prise d'eau d'Alzeau) 的紀念碑，大理石碑刻的正面和碑陰記載 1665 年 Pierre-Paul Riquet (1680) 提出建造皇家運河的議案，經路易十四於 1666 年十月下詔同意開鑿，由 Riquet 監督執行，科羅貝檢核，於 1681 年通航的重要事紀 (作者攝於 2017 年 7 月)

塞納河北邊的國家圖書館舊址 (site Richelieu) 內部。詳 Colette Meuvret, *La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s de France, 1948), pp. 395-408; Marion Bebout, "La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Histoire et perspectives," *Bulletin des bibliothèques de France*, Paris, 27:8 (1982), pp. 479-480.

然而，科羅貝開源節流、致力增加國庫財富的政策與太陽王的奢華品味和對外戰爭的策略有所抵觸；在總攬大權後不久，從 1671 年開始亦面臨失寵的命運。科羅貝繼承亨利四世的宗教寬容政策以維護國內的工商業發展的努力，也在其逝世後隨著 1685 年南特詔書的廢除而功虧一簣。大批具有技能的手工藝匠逃離法國到臨近的新教國家定居，在當地建立新的手工業中心而形成法國國家手工業強勁的競爭對手，英、瑞、德等地新興的絲織中心對法國蠶桑絲織業造成的衝擊，即為最明顯的例子。

三、法國東印度公司的成立與遠東貿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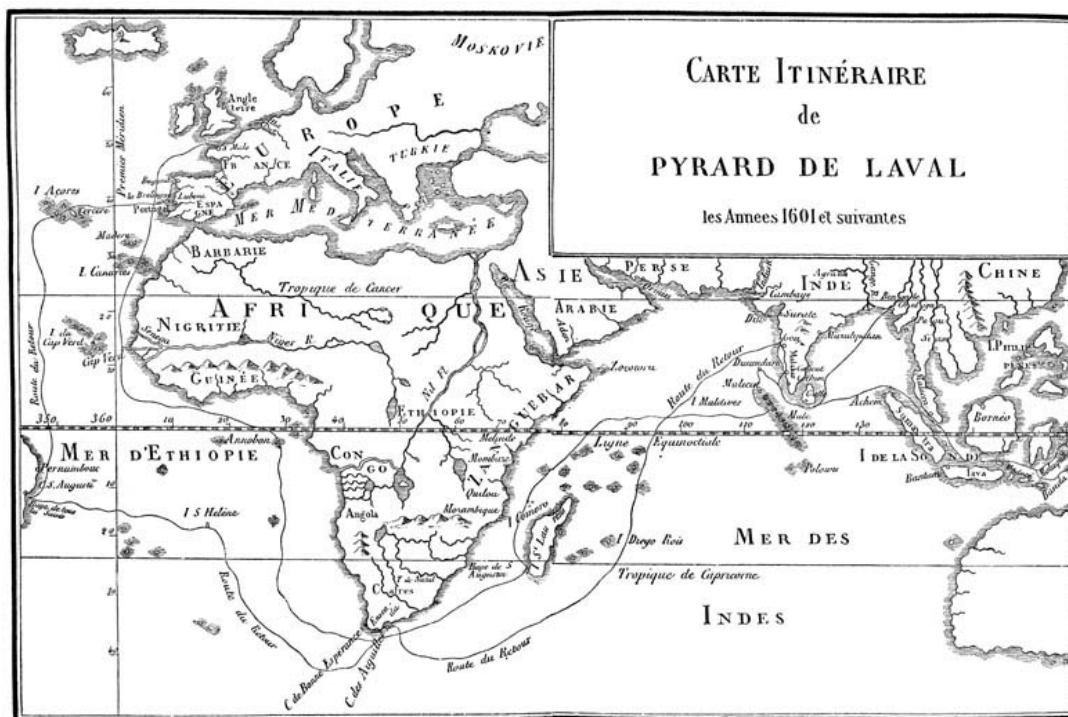
十六世紀下半葉，許多諾曼第和布列塔尼半島的海員、冒險家和海商公司在利潤豐厚的遠東貿易強烈吸引下，先後嘗試尋找進入東印度海域的航線（圖二）。然而，法國船隻除了遭受風暴的摧殘以及傳染病的侵襲外，還經常遭受其他歐洲海上強權—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英吉利等國武裝船隊的攻擊，貨品和船隻經常受到劫掠，甚至被摧毀⁵⁵。

東印度地區的遠洋貿易雖然給予航海家和探險家獲得鉅利的契機，但遠洋航行潛在的危險（例如：暴風雨、觸礁等造成的海南，以及遭遇海盜劫掠），加上長期海運需要的龐大資金，海商一般難以獨自承擔如此巨大的風險。十七世紀初，英國和荷蘭海商分別於 1600 年和 1602 年集資合股成立東印度公司，組織武裝船隊，並向皇家申請海洋貿易特權⁵⁶。英、荷海商憑著優秀的航海技術與堅固的武

55 法國最早進入東印度洋的航海家當為上文提及的，留下著名的東印度遊記的拉瓦勒的皮哈河，一位出身布列塔尼半島的海員，屬於摩鹿加（Moluccas）商業公司。1601 年從布列塔尼半島的聖馬洛港（Port St-Malo）出洋東行，6 月 21 日在非洲東部海岸遇到荷蘭船隻，被後者誤射的砲彈打壞船帆；稍後在幾內亞灣的安諾本島不幸遇到葡萄牙船隊，8 月 29 日再度受到攻擊，船員被俘。1602 年初在馬達加斯加島又遇到颶風，船隻和海員均面臨嚴峻的考驗；在之後數月的海岸航行中，四十幾位船員先後罹病。7 月 3 日半夜在馬爾代夫島（île maladive）附近的海域擱淺、遭遇船難，而成為當地國王的俘虜。詳 François Pyrard, *Voyage de François Pyrard de Laval*。

56 1600 年 12 月 31 日倫敦商人獲得伊麗莎白女王（Elisabeth I, 1558-1603 在位）的特許狀，成立倫敦商人進入東印度貿易董事公司（The Governor an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London Trading into the East Indian），並選定史密斯爵士（Sir Thomas Smith）為總經理；1612 年開

裝船艦，以及有效率的貿易組織和商業政策，快速取代葡、西，成為印度洋貿易的霸主⁵⁷。



圖二、《拉瓦勒的皮哈河自 1601 年開始數年的航路圖》（*Carte Itinéraire de Pyrrard de Laval, les Annees 1601 et suivantes*）

始模仿荷蘭東印度公司採取合股集資的方式籌措資金。及至 1694 年英國國會宣佈「任何英國公民都有與東印度群島進行貿易的權力」，迫使東印度公司不得不於 1698 年開始，以向皇室認購公債的方式換取東方貿易特權。同年，國會通過新法案，允許認購一定額度國債的人得以同等金額參與印度貿易，而有其他東印度公司的成立。1702 年新、舊東印度公司在英國政府的堅持下合併，命名為英商對東印度貿易聯合公司（The Unite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England 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並以 320 萬英鎊的借貸給皇室以換取對東方貿易的壟斷權（汪熙，《約翰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有關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整體介紹可參考 Femme S. Gaastr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倪文君譯，《荷蘭東印度公司》，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1）。

57 十六、十七世紀，歐洲國家在印度洋地區的勢力消長，美國南亞研究史家費伯在其專書 *Rival empires of trade in the Orient, 1600-1800*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6) 中有細緻的分析，作者特別在第二章（John company at Work）分別針對英國和荷蘭如何巧妙地使用與地方政權的協商，或利用地方政權間的間隙在需要時以武力出兵，以達到其建立遠東商站或據點的目的的過程，有詳細的分析、考證與論述；該章闢有小節介紹法國勢力在該地區的建立。

英國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成功鼓勵法國政府效仿其先例，先是在 1604 年成立第一家擁有印度洋貿易壟斷權的法國東印度公司，然而苦於資金的缺乏和航海技術的不足，且受到荷蘭東印度公司和法國聖馬洛（St. Malo）海商的排擠，而以失敗告終⁵⁸。1626 年，紅衣主教希敘里爾試圖推動大規模貿易公司的成立，以與其他洲進行貿易，且獲得相當成果：在這些公司的推動下發展了對非洲和美洲的貿易。然而由於海洋城市商人的猶豫態度，有關東方貿易的計劃卻完全失敗⁵⁹。1642 年，路易十三頒給一家航海公司在非洲東岸和馬達加斯加島的貿易獨佔權（monopole），希望以此為據點向東拓展貿易；次年更授予該公司在東印度貿易的特權。然而由於資金的不足，以及其他早已在東印度海域建立商業網絡的歐洲國家的阻撓，這家公司很快就面對倒閉的命運⁶⁰。

1664 年，在科羅貝的建議下，太陽王成立法國東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授予東印度貿易獨佔權，並與 1660 年創立的中國商業公司（Compagnie de Commerce à la Chine）合併⁶¹。同時仿效英、荷東印度公司集資合股的方式以籌措所需的龐大資金。科羅貝還延攬了曾任荷蘭東印度公司日本分部總經理的卡弘（François Caron, ca 1600-1667）來擔任法國東印度公司的首任總監。1665 年，卡弘在馬達加斯加島建立據點，計畫將之建設為法國東進的基地；接著在印度半島西岸北邊的蘇哈特（Surate，又音譯為蘇拉特，圖三）建立了第一個在東印度的商站⁶²，法國勢力隨之迅速在印度半島擴張：先後建立錫蘭（1667）、彭迪切希（Pondichéry，又譯為本地治裡，1672）等多個商站。

58 Henri Cordier, *La France en Chin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 documents inédits, publiés sur les manuscrits conservés au dépôt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avec une introduction et des notes* (Paris: Ernest Leroux, Éditeur, 1883), p. 1.

59 Philippe Haudrère, *Les Compagnies des Indes orientales, trois siècles de rencontre entre Orientaux et Occidentaux* 東印度公司：三個世紀東西方的遭遇 (Paris: Desjonquères, 2006), p. 70。

60 Pierre Clément, *Histoire de la vie et de l'administration de Colbert*, p. 171; Henri Cordier, *La France en Chin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 pp. XXV-XXVII.

61 同時成立的西印度公司主要進行與北美的貿易（Henri Cordier, *La France en Chin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 pp. XXV-XXVII）。

62 Jacques Weber, “Les Comptoirs, la mer et l’Inde au temps des Compagnies [東印度]公司時代的商站，海洋與印度,” *Revue d’histoire maritime*, 1(1997), pp. 149-195.



圖三、1751 年的印度半島（淺色區域為法國的勢力範圍，Charles Joppen, *Historical Atlas of India*），Surate 位於左上角彭迪切希位於印度半島右下方，近錫蘭島處

然而法國印度公司的股份認購主要由王室和貴族成員出資，具有濃厚的官方色彩，與英、荷的東印度公司以海商與市民為主要股份持有者的經營方式大異其趣⁶³。雖然科羅貝建立了東、西印度公司並給予貿易特權，然而公司卻傾全力經營北美和馬達加斯加殖民地的貿易而從未行使東印度海域貿易的特權。巴黎充斥著來自美洲的咖啡、糖、可可等奢侈品，與英、荷兩國的東印度公司藉由東印度洋的區域貿易，和自遠東進口歐洲市場珍貴的手工製品及原料，以製造龐大利潤的模式全然不同：法國自美洲進口的商品主要滿足王室、貴族和新興階級的消費需求，卻未能為國家增加財富。此外，法國東印度公司用以維持馬達加斯加據點的費用過於龐大，加上人員內部的矛盾與衝突，使得東印度公司的經營困難倍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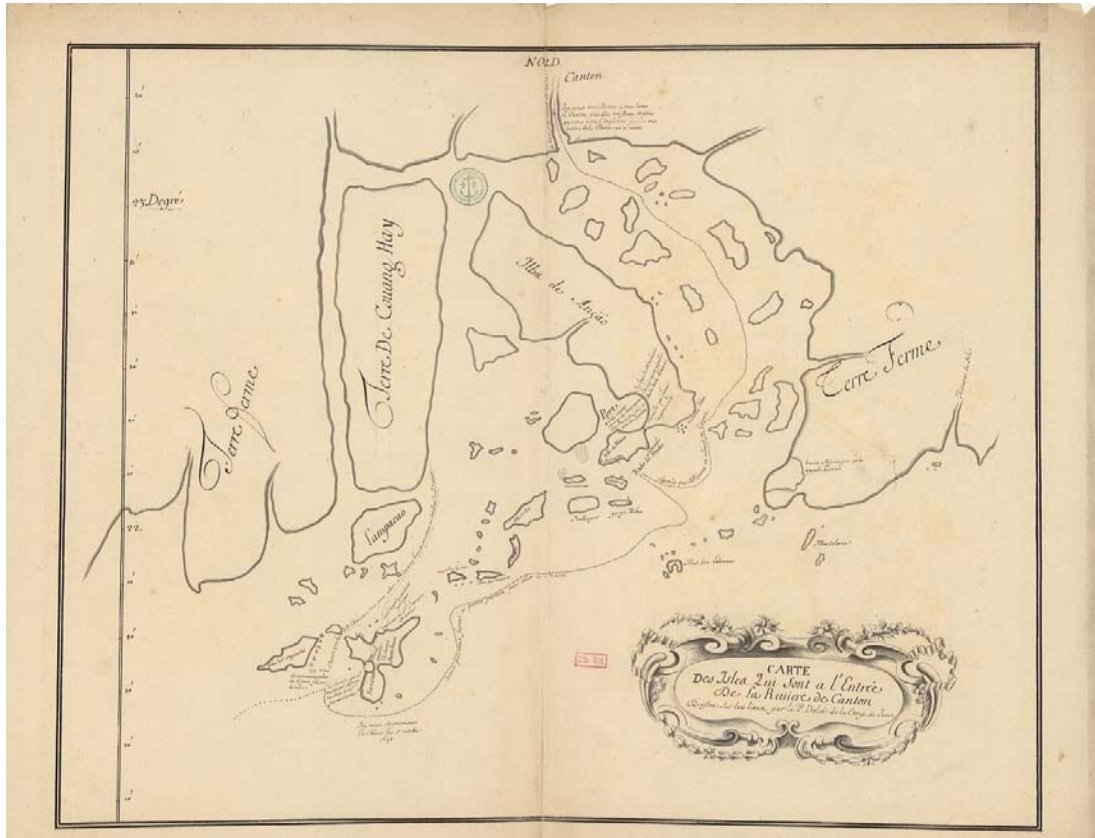
1698年初，馬賽商人笏丹·德·古榭（Jourdan de Groucé）向東印度公司申請派遣船隻到中國的許可，並請求該公司將對華貿易的獨佔權，以及擁有並經營東印度地區尚未被其他歐洲國家佔領土地的所有權（concession et propriété de toutes terres non habitées par les puissances d'Europe）等特權，轉讓給他名下的笏丹公司（Société de Jourdan），獲得法國政府首肯並頒布法令，將原屬於海事部東印度公司的特權轉讓給笏丹公司⁶⁴。同年11月2日，第一艘法國東印度公司的商船《阿曼菲提特》號終於現身於廣州河上（圖四）⁶⁵，船上搭乘著「國王的數學家」—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以及康熙皇帝委託在歐洲尋找的，具有科學知識和技術的法國

63 Pierre Clément, *Histoire de la vie et de l'administration de Colbert*, pp. 170-185。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的建立源於1594年西班牙國王菲律賓二世（Felipe II de España, 1556-1598年在位；1581-1598年葡萄牙國王，稱腓力一世）禁止佛蘭德（Graafschap Vlaanderen, Comté de Flandre，包括今比利時東、西佛蘭德省和法國北部一隅，以及荷蘭西南的一小部分）海商到里斯本購買來自東方商品所採取的報復措施。在此之前，荷蘭海商已擁有為數龐大的船隊。可參考 M. Aymard, *Capitalisme hollandais et capitalisme Mondial* 荷蘭的資本主義與世界性的資本主義（Paris: La Haye), Mouton, 1982.

64 法國國家海外檔案館，C¹ 8 folio 85; 95-96; 92-93; Darrac, *Mémoire statistique des Établissements français en Asie*。

65 《阿曼菲提特》號於1698年3月6日離開法國西岸臨大西洋的拉羅歌勒（La Rochelle）港，11月2日抵達廣州；1700年1月26日駛離廣州返歐，8月3日回到路易港。此次航行的紀錄見上文提及的伯希和分六期刊載於 *Journal des savants* 的“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avec la Chine. Le Premier voyage de l'Amphitrite en Chine”。

耶穌會士⁶⁶。



圖四、廣州河出海口的島嶼，耶穌會 Dolcé 神父實地繪製 (Carte des isles qui sont à l'entrée de la rivière de Canton, par le P. Dolcé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1698. BnF Gallica)。Dolcé 極可能為 1698 年十一月四日抵達廣州的翟敬臣 (Charles Dolzé, 1663-1701) 的另一種拼寫方式 (Joseph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p. 78)，十九世紀以前的法國檔案中常可見到類似的例子。

66 法國國家海外檔案館，C¹8 folio, 150 bis-156。「國王的數學家」是路易十四頒賜給第一批來華耶穌會士的封號，包括洪若翰、白晉、張誠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李明 (Louis Le Comte, 1655-1728)、劉應 (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還有決定留在暹羅的塔夏 (Guy Tachard, 1651-1712) 等六位傳教士。有關「國王的數學家」派遣使華的緣起與過程，詳第四小節。

1700年初,《阿曼菲提特》號滿載中國商品離開廣州,於8月初駛入洛里昂市的路易港,經路易十五(Louis XV, 1715-1774在位)詔允,將載回的遠東商品在南特(Nantes)出售。自此,位於盧瓦河(La Loire)下游北岸的大西洋沿岸大城—南特—成為來自印度洋東方商品的合法銷售市場,直到1734年被洛里昂取代為止⁶⁷。同年10月23日,筭丹和他的合夥人與東印度公司取得協議,獲得與中國貿易的轉讓權,並將公司名稱正式改為《中國公司》(Compagnie de la Chine)。雖然該公司擁有「唯一獲准在法國出售印度和中國的絲綢」的特權⁶⁸,但卻並非是唯一擁有法國國王頒給對華貿易獨佔權的貿易公司:1705年10月,路易十五頒布詔書成立皇家中國公司(Compagnie royale de la Chine);1712年國家議會再度通過法令成立另一家中國公司。然而,一如最早獲得東印度貿易獨佔權的諸多法國印度公司,這些商業組織從未使用過對華貿易的特權。

科羅貝的富國強兵政策中,在發展國家農業、手工業以增加國家財富的同時,試圖減少因大量原料和手工業製品的進口而造成的漏卮。為了保護剛起步的國家手工業—特別是絲織業—免受東印度進口的絲織品和棉印花布的激烈競爭,法國政府採取限制入口商品數量、提高關稅的保護政策。科羅貝去世後,接任的盧瓦侯爵(François-Michel le Tellier, marquis de Louvois, 1641-1691)⁶⁹更將此政策

67 南特市政府圖書館(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de Nantes)藏有數封法國海商與中國行商簽訂購買茶葉的契約;南特歷史博物館(Musée d'Histoire de Nantes)收藏有來自中國的瓷器和絲織品,以及見證十八世紀中法海洋貿易的文物與商品。可參考該館2010年的特展專刊:Musée d'Histoire de Nantes, *La soie et le Canon France-Chine, 1700-1800* (Paris: Gallimard, 2010)。

68 筭丹以兩萬五千里爾(livres)的代價,「購買」中國貿易的獨佔權,此為獲得國王特權的印度公司經常採取的措施之一。協議中並規定,筭丹公司的船隻不得在航行期間,停靠任何法國在非洲東岸和印度的商港(Morellet, *Mémoire sur la situation actuell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pp. 17-18)。在長達八到九個月的長程航行中,不得停靠任何法國商港進行補給或貿易,對於大帆船時期的遠洋貿易而言,無疑是非常艱鉅、且不利於貿易活動的苛刻限制,或許可以為法國東印度公司船隻鮮少出現於遠東海域提出部分解釋。此現象引起當時法國人士,如莫黑雷等人的批評,認為有損法國的對外貿易,而有提倡自由貿易聲浪的出現。

69 1677開始,盧瓦侯爵擔任路易十四的大司法官(chancelier),是法蘭西國防大臣、首席大法官巴赫吉爾侯爵(Marquis de Barbezieu)泰里耶(Michel le Tellier, 1603-1685)的長子,15歲時繼承其父國王國防大臣的職務(secrétaire d'État de la Guerre),1672年成為國事顧問(ministre d'État)。1683年科羅貝去世後,取代其職務。盧瓦主張對外戰爭以及南特詔書的廢除。1671年,科羅貝試圖重整皇家財政,而與擔任國防大臣的盧瓦對立。在其陰謀設計下,科羅貝快速失去路易十四的寵信。

發展到極致：不但限制法國東印度公司從印度洋進口的商品數量，甚而採取全面禁止的措施：1686年10月26日頒布法令禁止從「印度」進口印花布和有金、銀紋飾的織品⁷⁰；1687年更規定法國東印度公司必須出口價值五十萬磅的法國產品到亞洲，才得以從東方進口十五萬磅的絲織品⁷¹。眾所皆知，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初的歐亞海洋貿易，最高的利潤來自香料、織品、瓷器等奢侈品和貴金屬的交易：伊比利亞半島和新教國家的海商以來自中南美洲和日本的白銀換取中國的生絲、絲綢、瓷器和黃金，以其中一部份的商品在印度洋海域進行區域貿易，換取東南亞的香料與其他原料和商品，再運回歐洲市場，並以高於原價數十倍的價格售出，以賺取暴利。法國不似西班牙一般擁有美洲的銀礦，香料市場和印度棉印花布又被英、荷東印度公司壟斷，再加上法國本土禁止絲綢和印花棉布入口，將法國東印度公司的遠東貿易置於與高利潤商品絕緣的不利地位。遠洋貿易的利潤微薄、外加與英、荷等東印度公司的競爭，對於法國東印度公司的財務狀況有相當不利的影響，最後將之推向破產的邊緣，終於1706年宣佈倒閉。

1719年，路易十五下詔將東方公司(Compagnie d'Orient)、西方公司(Compagnie d'Occident)和中國公司合併，成立法國東印度公司。此決定明顯改善法國在遠東貿易財務和貿易的困難，進而得以在印度洋貿易中獲得利潤。修院院長莫黑雷(l'abbé Morellet)在《印度公司現狀報告》(*Mémoire sur la situation actuell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中，根據法國東印度公司買進、賣出的紀錄，對該公司自1725年到1769年期間，與中國貿易所獲得的利潤進行了評估。摩赫雷認為1736至1743年間為該公司的高峰期，平均利潤達到141¼%；而獲利最低的1768年度，公司仍有67 2/3 % 的利潤(詳下表)⁷²。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國對英七年戰爭(1756-1763)失利而喪失其位於印度半島的絕大部分殖民地和商業據點之前，法國東印度公司

70 Paul Kaepelin, *La Compagnie des Indes et François Martin*, pp. 199-205。法令中所指的「印度」包含現今印度半島、東南亞和中國等區域，是近代早期歐洲的習慣用法。

71 1700年路易十五允許中國公司成立的法律中，同樣規定了出售印度和中國絲綢《額度為十五萬磅》的限制(Louis Dermigny, *La Chine et l'Occident*, t. I., pp. 397-398)。

72 轉引自 Henri Cordier, *Les origines des deux établissements dans l'Extrême-Orient: Chang-hai, Ning-po, documents inédits* 法國在遠東兩個機構設置的源起：上海和寧波 (Paris: [s.n.] 1896), p. XXIII。

的勢力在遠東快速擴張，影響力擴及印度半島東邊大半部；雖然在此時期中國南海的海面上仍鮮見法國船隻的蹤影。

表一：法國東印度公司貿易利潤

根據莫黑雷《印度公司現狀報告》(頁 125-126) 整理

年份	1725-1736	1736-1743	1743-1756	1764	1765	1766	1767	1768
利潤(%)	104 ½	141 ¼	116 ⅔	85	81 ½	71 ½	68	67 ⅔

十八世紀六〇年代開始，法國商人受英國的影響，鼓吹「工作自由」(liberté de travail) 的聲浪日益高漲，在開明人士積極爭取工商業活動自由的努力下，法國東印度公司的獨佔權終於 1769 年被取銷，同年 8 月 13 日將公司關閉⁷³。由 1770 年組成的廣州管理委員會 (Conseil de Direction de Canton) 負責處理廣州事務，委員會由原東印度公司的三位二級船務監督 (deuxième subrécargue) 提摩帖 (Thimotée)、德·侯俾揚 (De Robien) 和克魯維 (Clouët) 等人組成⁷⁴。1776 年 2 月 3 日，路易十六頒布法令將原有的法國商館改組為領事館，並任命原東印度公司的船務總監 (subrécargue) 佛克朗 (C. Vauquelin) 擔任首任領事⁷⁵。1782 年佛克朗去世後，由斐也雅 (Vicillard) 以副使的身分繼續處理領事事務。由於領館人員的待遇過低，加上內部人員的權力紛爭，領事館的設置困難重重。斐也雅離開廣州後，由原來的翻譯人員小德金 (De Guignes fils, Chrétien-Louis Joseph de Guignes, 1759-1845) 代理。法國大革命之後，小德金藉著 1801 年伴隨荷蘭使團訪問北京的機會，經由陸路返回歐洲⁷⁶。此後，法國領事館陷入真空的狀態⁷⁷。直至 1828 年為了處理《航海

73 1769 年 8 月 13 日內閣會議判決 (Arrêt du Conseil du 13 août 1769)，詳 Henri Cordier, *La France en Chin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 p. 168。

74 Henri Cordier, *La France en Chin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 p. 3.

75 相關法令和條款見高第的 *La France en Chin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頁 67-75。該作者的 *Les origines de deux établissements français dans l'Extrême-Orient* 有詳細的敘述 (頁 XXIII-XXV)。

76 小德金的父親為法國科學院院士，十八世紀知名的東方學家德金 (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小德金的稱謂即為了與其父有所區分。小德金取道北京返回法國，並留下沿途觀察的紀錄與插圖：*Voyage à Peking, Manille et l'île de France, faits dans l'intervalle des*

號》(*Navigateur*)的船難事件，法國政府任命法國北部當柯爾克(Dunkerque)港的海商杰納鄴(Benoît Gernaert, 出生於 1792 年)為領事，專門負責與廣州官員交涉該事件的相關事宜⁷⁸，才再度有法國領事的任命。然而，根據美國商人亨特(W. C. Hunter)的見證，杰納鄴在南中國時泰半寄居澳門，廣州的法國領事館事實上形同虛設⁷⁹。

四、耶穌會士的派遣

使華耶穌會士的派遣，為科羅貝發展遠東貿易與國家農工商業的一環：希望藉由法國耶穌會士與清朝皇帝的接觸，獲得與中國貿易的特權。事實上，早在十七世紀初，路易十三的內政大臣希敘里爾主教即已萌生效仿伊比利亞半島王國以「傳教與通商」併行的方式拓展法國在印度洋海域的貿易。然而，在航海路徑受掣於教皇授予葡萄牙國王的遠東地區保教權(Patronatus missionum)，且印度洋貿易圈為歐洲海上強權國家控制的情勢下，法國政府雖曾試圖尋找經由陸路進入中國的路徑，終未獲俄國同意借道而被迫放棄。在陸路和海路均受阻撓之下，法國政府注意到中南半島南端的暹羅(Siam, 今泰國)⁸⁰不但與中國和日本的貿易頻繁，且擁有大量來自兩國和東南亞地區的精美商品；更重要的是，暹羅非但獨立於歐洲列強的勢力範圍之外，且控制著廣大的海域(圖五)，可望成為法國進入遠東貿易市場的據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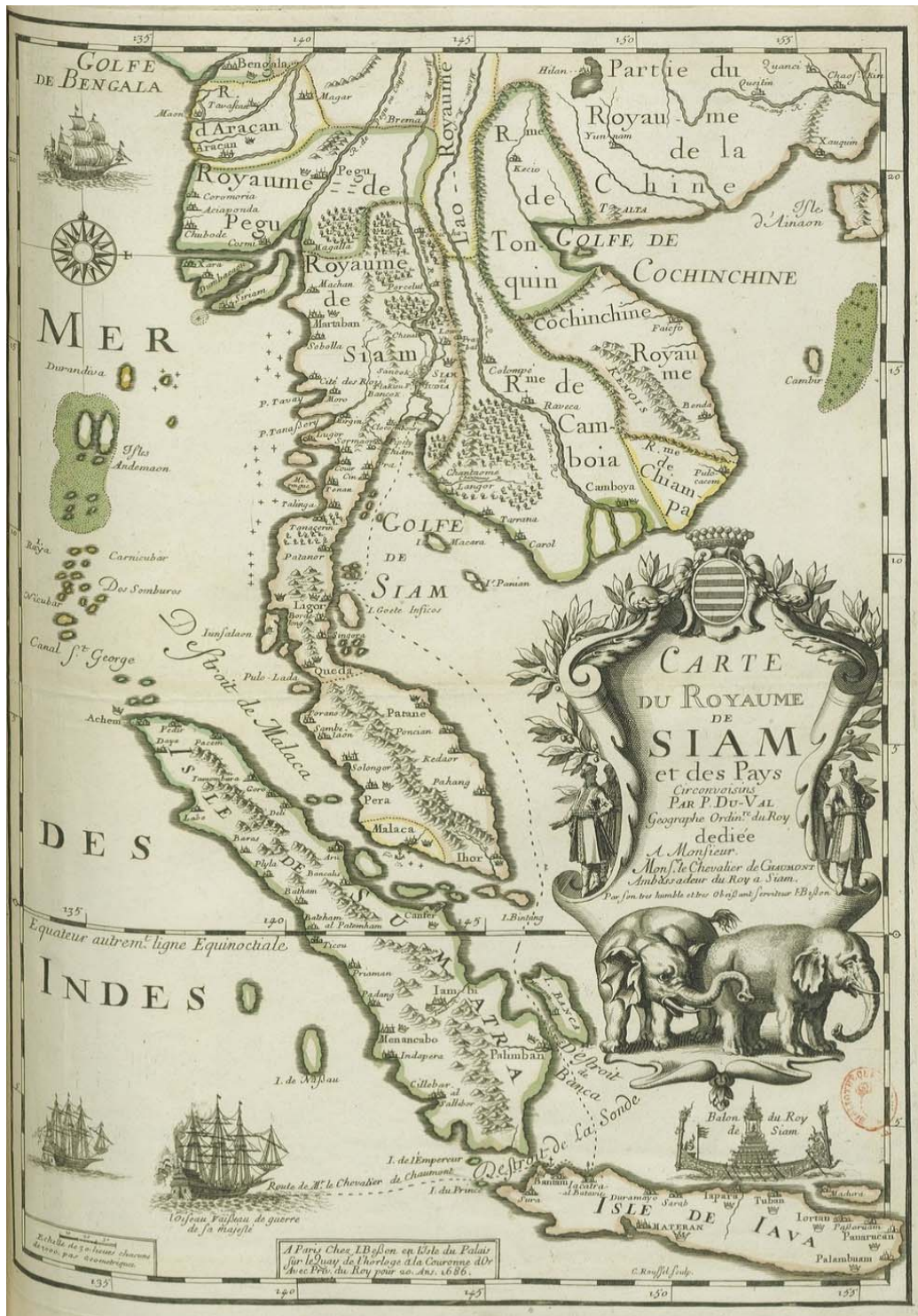
années 1784 à 1801 1784 至 1801 年間北京、馬尼拉和法蘭西島遊記 (Paris: l'imprimerie impériale, 1808)。

77 Henri Cordier, *La Mission Dubois de Jancigny dans l'Extrême-Orient (1841-1846)* 1841 至 1845 年間真盛意的遠東任務 (Paris: Librairie de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1916), p. 29。

78 Henri Cordier, *La Mission Dubois de Jancigny*, p. 29, 33; Richard Sola, "Histoire de Consulat de France à Canton: 1824-1844 1824 至 1844 年間法國駐廣州領事館史" (Paris: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mémoire de D.R.E.A non publié, 1981), p. 33。

79 William C. Hunter, *Bits of Old China*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Co., 1885), p. 207. (章文欽等譯,《舊中國雜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

80 暹羅為清廷允許定期朝貢的國家,《大清會典》載有暹羅國王和使臣受清帝惠贈的禮品清單(《(乾隆)欽定大清會典》卷 56〈禮部〉)。



圖五、《暹羅王國及其鄰近國家地圖》，輿圖出版商杜·瓦勒 (Pierre Duval, 1619-1683) 題贈給脩孟騎士 (Carte du royaume de Siam et des Pays circonvoisins, par P. Du-Val, 1686, BnF Gallica)

十六世紀七〇年代中，葡萄牙王室開始出現財政困難的跡象，1580 年代情勢更加窘迫，而給予法國拓展東印度洋貿易的願望展現新機。鑑於擁有保教權的葡、西兩國在遠東傳教事業不彰，羅馬教皇先於 1622 年成立傳信部（*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法文：Congrégation de la propagande），再於 1627 年設立專門訓練傳教士的神學院。1650 年前後，在遠東遊歷傳教了二十多年的侯德（Alexandre de Rhodes，又譯作亞歷山大·羅德，1591-1660）⁸¹ 返回羅馬，向教皇亞歷山大七世（Alexandre VII）報告葡萄牙不再適任遠東傳教會贊助國的事實，建議另尋其他國家的經濟支持，並徵求志願者⁸²。侯德認為帕呂主教（François Pallu，又名陸方濟，1626-1684）和藍倍赫主教（Pierre Lambert de la Motte，1624-1679）為派遣前往遠東傳教的適當人選⁸³。1663 年，帕呂主教率領巴黎外方傳教會（*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 MEP*）的傳教士抵達暹羅，在當地設置遠東傳教中心以收容受到中國和越南政府宗教迫害的教士。帕呂主教也接受了法國政府的委託，在當地蒐集有助於甫創立的東印度公司發展遠東貿易所需的商業情報，並協助拓展與暹羅的貿易、勘察適合成立商站的據點等任務。

1678 年，擔任欽天監正的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眼見宮中傳教士日漸凋零，於是向歐洲發出派遣使華傳教士的邀請，以回應對歐洲科學技術極感興趣的康熙皇帝之要求⁸⁴。在帕呂主教和深受東方文化吸引的萊布尼茲等人

81 出生於法國南部亞維儂（Avignon）的侯德於 1612 年進入羅馬的耶穌會，1618 年離開歐洲前往日本，因故在澳門等待一年半後，被派遣到交趾支那（或稱南圻，Cochinchine）而往返於澳門、越南的東京（Tonkin）、菲律賓群島和南圻等地的教會，曾被荷蘭人囚禁於巴達維亞。返回羅馬和法國後，成立遠方傳教會（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pp. 184-185; Henri Cordier,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eking," p. 21）。

82 Ma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p. 11。梅瑞克認為侯德於 1652 年返回羅馬，然根據琅元（Alexei Volkov）的研究，應為 1649 年（On two maps of Vietnam by Alexandre de Rhodes, in Luís Saraiva (eds), Catherine Jami, *Visual and textual representations in exchanges between Europe and East Asia, 16th – 18th century*,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8, p. 103）。

83 1658 年，帕呂和藍倍赫兩位主教被任命為遠東的代牧（vicar apostoli），與侯德同為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創設人。帕呂留下數部在遠東宣教的記載：如：*Relation abrégée des missions et des voyages des évêques français* 法國主教幾次任務遊記概述，1668；*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s missions et des évêques français vicaires apostoliques dans la Chine et dans les royaumes de l'Orient* 傳教使團與法國主教代牧在中國和東方王國現況報告，1677。

84 該封拉丁文的信函於 1678 年在北京刊刻，法文摘錄出版於 1681 年 9 月號的 *Mercurie galant* 文雅信使，頁 194-211。

的敦請之下，科羅貝建議路易十四接手葡萄牙王室，贊助使華耶穌會士的派遣，獲得皇家科學院院士們的支持。此與當時法國正發展、改進地圖測繪技術有密切的關係：為了精確計算地球的直徑以完成世界地圖的繪製和法國輿圖的修正（圖六），法國科學院和皇家天文台台長卡西尼（Giovanni Domenico Cassini, 1625-1712）派遣大量測繪人員奔赴世界各地進行實地勘查與測量。由於清朝嚴格施行禁止外國人擅入國境的政策，法國想要派員進入中國實地測繪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法國耶穌會士如能獲得在中國境內進行實測的機會，將可提供完成世界地圖繪製所需的珍貴數據，實現路易十四的心願。



圖六、桑松（Nicola Sanson, 1600-1667），*Galliae antiquae descriptio geographica* 古代高盧[法國]地圖，1627（BnF Gallica）。桑松為十七世紀著名的法國輿圖繪製師，由於地球直徑的高估，地圖中法國的東西距離明顯地較真實的寬度來得大。

1685 年 1 月，法王簽署派遣法國耶穌會士來華的諭令，明訂「每年以九千二百金元補助在印度及中國的法籍耶穌會士二十人」⁸⁵。同年 3 月，「國王的數學家」在踏上遠東旅程之前，受到科學院院士們的邀請，參觀科學院並獲贈數學、天文和測繪所需的儀器（圖七）。科學院士還指導耶穌會士們操作這些儀器的方法⁸⁶。科羅貝於 1683 年辭世以前，曾在一次會談中向國王的數學家之一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神父明白地表示⁸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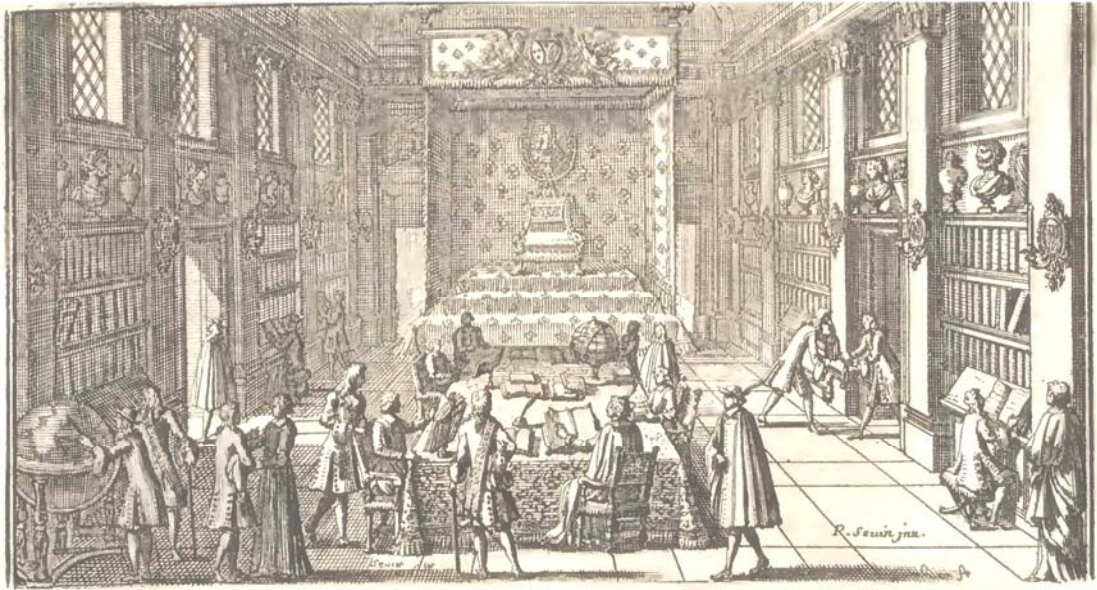
神父，科學並不值得您千辛萬苦遠渡重洋，離鄉背井地到遠離親友的另一個世界去生活。然而在讓異教徒皈依，以耶穌基督之名拯救靈魂的神聖使命驅使之下，神父們經常踏上類似的旅程。我希望他們可以利用這些機會，在宣傳教義的任務之外，進行大量觀察並蒐集當地有助於改進我們科學和工藝的訊息。

科羅貝除了希望耶穌會士能善用置身紫禁城的特殊機緣，向清朝皇帝爭取與中國通商的特權，更希望耶穌會士利用在中國旅行的機會，實地考察中國農業、手工業的生產技術，蒐集科技、藝術的相關訊息與資料，藉以提升法國農、工、商業的技術、刺激生產工業的發展。可惜科羅貝在離世前未能親眼看到計畫的實現，而由他的繼任者盧瓦完成遺志。

85 方豪，《中國天主教人物傳》，第二冊，（香港：公教真理學會；臺中：光啟出版社，1970），頁 269-270。

86 Guy Tachard, *Voyage de Siam des pères jésuites envoyés par le Roi aux Indes & à la Chine* 國王派遣至印度和中國的耶穌會神父的暹羅之旅（Paris: chez Arnould Sencuze, Daniel Horthemels, 1686), pp. 7-11。

87 “Les sciences, mon Père, ne méritent pas que vous preniez la peine de passer les mers, et de vous réduire à vivre dans un autre monde, éloigné de votre patrie et de vos amis. Mais comme le désir de convertir les Infidèles, et de gagner des âmes à Jésus-Christ porte souvent vos Pères à entreprendre de pareils voyages, je souhaiterais qu'ils se servissent de l'occasion; et que dans le temps où ils ne sont pas si occupés à la prédication de l'Évangile, ils fissent sur les lieux quantité d'observations, qui nous manquent pour la perfection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 杜赫德將之節錄於《大中華帝國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1735, tome 3, p. 140）。



圖七、耶穌會士受邀參觀科學院(Guy Tachard, *Voyage de Siam des pères jésuites envoyés par le Roi aux Indes & à la Chine*, Paris: chez Arnould Sencuze, Daniel Horthemels, 1686, p. 1)

1684 年暹羅使團的來訪。暹羅使團在在巴黎的出現不但引起法國朝野的注意，並掀起「異國情調」(exotisme) 的熱潮，同時給予法國耶穌會士得以實現前往中國計劃的契機。次年，脩孟騎士 (Chevalier de Chaumont, 1640-1710) 被任命為出使暹羅特派大使 (ambassadeur extraordinaire)，率領船隊護送暹羅使團歸國，同時負有勸使暹羅國王皈依天主教，以及在當地建立印度洋貿易據點之雙重任務⁸⁸。1685 年 3 月，護送使團的《大鳥號》(l'Oyseau) 從位於布列塔尼半島西端的布列斯特 (Brest) 港出發，隨行的尚有路易十四的六位「國王的數學家」。脩孟騎士與暹羅國王那萊 (Narai, 1629-1688) 的協商相當順利，法國東印度公司不但可以在暹羅獲得來自中、日的商品 (圖八)⁸⁹，而且可以享有其他商業的利益。除了留在

88 Henri Cordier, *La France en Chin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 p. XL 以及 Belvitch-Stankevitch, *Le goût chinois en 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XIV* 路易十四時代法國的中國風尚, thèse de doctorat d'université à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Paris: Jouve et C^{ie}, 1910), pp. 23-24.

89 商品的來源一部分由當地的中國商人提供，一部分來自暹羅與中國的朝貢貿易。然法暹的外交關係終因法國人員過度介入暹羅王國的政治，導致 1688 年的政治革命，隨著法國人員的被迫離開而宣告結束。法國國王頒布的相關法令和條款見載於高第編纂的史料 *La France en Chin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 (頁 XLI-LIV)。

暹羅的塔夏神父之外，其他五位「國王的數學家」於 1687 年 6 月改乘華商王華士的商船，繞過澳門，於同年 7 月底達寧波，經浙江巡撫金鉞奏報後，於 1688 年底抵達北京⁹⁰。



圖八、耶穌會士塔夏描寫暹羅風俗的插圖，呈現當地生產用以將牙齒塗黑的檳榔、來自中國和日本的茶和人參等的植物圖像（Guy Tachard, *Voyage de Siam*, p. 373.）

90 《大鳥號》於同年 9 月抵達暹羅，同船的傳教士尚有斯瓦濟修道院長（François-Timoléon de Choisy, 1644-1724）以及擔任翻譯的外方傳教士瓦榭（Bénigne Vachet, 1641-1720）。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據河北獻縣天主堂 1931 年版影印，上海書局），卷六，頁 323-324；方豪，《天主教人物傳》，第二冊，（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70），頁 270。

雖然盧瓦在政治上與科羅貝處於敵對的地位，但在接任後者職務後，仍遵循其「傳教、貿易、科學技術考察」的策略，以耶穌會士在遠東傳教的契機，建立對外貿易關係，並蒐集訊息以促進法國農工商業的進步與發展。確定耶穌會士得以成行後，盧瓦邀請科學院院士擬訂了一份問卷，作為傳教士在中國考察與搜集資料的依據，面向涵蓋歷史、文化、政治、制度、風俗、物產、科學、藝術和技術等領域，共計一百條的提問⁹¹。1696年李明出版的《中國近事報導》首次發布法國耶穌會士在中國初步考察的結果，將中國的文化、歷史、制度、建置、知識、醫學、物產和生產技術等做了全面而簡要的報導，獲得歐洲人的普遍歡迎，不但迅速再版，而且很快地被翻譯成其他歐洲語文。法國耶穌會士在華活動期間，正值歐洲啟蒙運動的巔峰，除了法國科學院院士以外，在華傳教士們尚與其他歐洲國家的學者維持書信往來，回覆院士和學者們提出有關中國的大量問題。傳教士在中國進行的觀察和蒐集的訊息大多根據歐洲學者們的提問，再將報告和蒐集的訊息透過東印度公司的信件傳遞系統寄回法國，或於返回歐洲時攜回。在科學和技術方面，提供歐洲學者豐富的重要數據與長時期實際操作的經驗，對十八世紀法國和歐洲的科學技術發展有深遠的影響⁹²。

然而，法國耶穌會士在中國的處境，並不似史料反映的傳教和考察活動的豐碩成果一般順遂。繼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發動宗教革命後，英國王室亦脫離羅馬教廷改奉新教；即便以「教廷長女」自居的法國王室亦對教會擁有可觀的財富，以及羅馬教廷的干涉有所不滿。身處清宮內廷的耶穌會士必

91 該問卷原計畫交給 1681 年從北京返回歐洲，以徵集具有科學知識的年輕傳教士隨其返回中國的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神父。然而當路易十四派遣的耶穌會士於 1685 年揚帆啟程時，柏應理因故未能同行，直到 1691 年才得以離開歐洲，不幸卻在果阿附近的海面遭遇船難。1689 年，萊布尼茲另外也寄給一位自北京返回歐洲的傳教士一份包含三十個問題的問卷。可參閱 Isabelle Deron-Landry, *La preuve par la Chine, La Description de J.-B. Du Halde, jésuite, 1735* (Paris: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02), pp. 150-168 (許明龍譯,《請中國作證：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頁 138-150)。

92 潘吉星在其《中外科學之交流》(香港：中文大學, 1993) 中列舉多例，並進行深入的探討；毛傳慧的論文“Enquêtes françaises sur la sériciculture chinoise, fin XVII^e-fin XIX^e siècles 十七世紀末至十九世紀末法國對中國蠶桑業的調研” (*Documents pour l'Histoire des Techniques*, Centre historique de documentation des techniques, 2007, nouvelle série n° 14, pp. 24-36)，以蠶桑為例，對中國知識、技術與相關訊息在歐洲的引進、傳播與利用，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與探討。

須遵循其宗教和世俗君主的指示與規定，尚須服膺清朝的法令和皇帝的旨意；而三者的宗教、政治和經濟立場與政策難免發生衝突與對立，造成夾在三者之間的傳教士立場的微妙和執行任務的困擾與阻礙。特別是在十七、十八世紀之交開始，越演越烈的「禮儀之爭」，將耶穌會士置於艱難的處境致中，且對其在華活動多有牽掣，並造成嚴重的影響。

十六世紀末，利瑪竇承認中國禮儀與基督宗教教義的相容性，即所謂的「利瑪竇規矩」，吸引許多對歐洲輿圖繪製和科學、技術感興趣的明末士人，如徐光啟（1562-1633）、瞿汝夔⁹³等受洗入教。利氏於萬曆二十九（1601）年抵達北京後，成功地在明朝京城創立耶穌會教會，開啟耶穌會士以歐洲科學和技術在華傳教的先河⁹⁴。然而，「利瑪竇規矩」卻引起部分耶穌會士和其他修會傳教士的質疑，進而掀起羅馬教廷和歐洲有關中國禮儀—特別是祭祖和祭孔是否見容於天主教義的一系列長期的爭議與辯論⁹⁵。羅馬教廷對中國禮儀的多方干涉，引起康熙皇帝的不滿：1707年康熙旨諭「眾西洋人自今以後若不遵利瑪竇的規矩，斷不准在中國住，必逐回去」⁹⁶。與此同時卻又對有科學知識和特殊才能的教士趨之若鶩，明白表示：「若西洋人內有技藝巧思，或係內外科大夫者，急速著督府差家人送來」⁹⁷；甚至如上文所提及的，派遣使華的法國耶穌會士返回歐洲，徵求具

93 瞿汝夔，字太素，江蘇常熟人，其生平可參考黃一農，〈瞿汝夔（太素）家世與生平考〉，《大陸雜誌》，85：5（臺北：1994），頁1-3。

94 有關利瑪竇進入中國傳教的過程，可參考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明史·列傳》，卷214，〈外國七〉等史料文獻。

95 1645年，根據多明我教士的描述，教宗伊諾森十世（Innocentius X, 1574-1655）曾禁止一些中國傳統儀式的施行，之後羅馬教廷對中國禮儀的關注時鬆時緊。1687年教宗伊諾松十一世（Innocent XI, 1676-1689）指派顏瑤（Carolus Maigro, 1652-1730）為福建的宗座代牧之後，禮儀之爭日趨白熱化。相關史料與論述非常豐富，在此不一一列出。可參閱陳方中、江國雄，《中梵外交關係史》（臺北：商務印書館，2003）；李天綱，《中國禮儀之爭：歷史、禮儀和意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David E. Mungello,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孟德衛，《1500-1800 中西方的偉大相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等著述。

9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三月十七日直郡王張常住 奏西洋人孟由義等九人請 安求票並履歷摺字〉，《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12。

9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兩廣總督趙弘燦等奏報粵東地方年成並查有新到西洋技藝人等情形折，康熙四十六年八月十三（1707.9.8）〉，《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一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72。

有科學、技術、醫學與藝術等專才的傳教士前往中國。

在華耶穌會士因此必須面對來自教廷的壓力：赫蒼璧（Julien-Placide Hervieu, 1671-1746）、馮秉正（Joseph-Anne-Marie de Mailla, 1669-1748）⁹⁸、卜文氣（Louis Porquet, 1671-1752）和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等多名傳教士均曾受到傳信部不遵守教規中有關禮儀規定的指控：1726年，決定將巴多明召回歐洲⁹⁹；馬若瑟（Joseph-Henri de Premare, 1666-1736）亦被指控因推崇《易經》而導致歐洲人對舊約尊崇的瓦解（il détruit la vénération pour l'Ancien Testament en exaltant le livre chinois Yi king），面臨教廷相同的決議¹⁰⁰。教廷面對禮儀之爭的強硬態度，與屢屢召回在華耶穌會士的措施，與法國政府希望透過耶穌會士促進中法貿易和進行在華科技調研的計畫，相抵觸並造成相當大的阻礙。1727年12月法國海軍部長暨東印度公司總裁賀介神父於是向教廷傳信部提出「停止運用權力召回北京的耶穌會士以免破壞這個耗費了大量金錢、時間和精力經營的虔誠成果」的請求¹⁰¹。此舉也凸顯羅馬教廷與法國政府矛盾的日趨緊張，以及教廷對歐洲世俗政權的約束力與影響力日漸衰微的趨勢。

十八世紀中葉，在法國和歐洲社會普遍對羅馬教廷和耶穌會士仇視情緒日益高漲的氛圍中，繼葡萄牙之後，路易十五亦於1764年下詔全面驅逐耶穌會士，並將耶穌會財產全數充公。1773年，教皇克萊蒙十四（Clement XIV, 1705-1774, 1769擔任教宗）通諭解散耶穌會¹⁰²，由外方傳教會接手選派傳教士的任務。路易十六

98 根據苟吉業（Jean-Baptiste Grosier, 1743-1823）神父的考證，馮秉正的本名應為 Moyria de Maillac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Paris, 1777, t. I, p. xxv)。馮秉正於1701年離開法國，1703年6月16日抵達澳門，曾參與河南、江南、福建和台灣等地的輿圖繪製。詳 Joseph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pp. 163-164.

99 Joseph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p. 195.

100 Joseph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pp. 209-210.

101 “Lettre du ministre de la Marine et le Directeur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海軍部長暨東印度公司總裁的一封信” par l'abbé Raguét, 引自 Camille de Rochemonteix, *Joseph Amiot, et les Derniers Survivants de la Mission Française à Pékin (1750-1795)* 錢德明與駐北京的最後幾位法國傳教士 (Paris: Librairie Alphonse Picard et fils, 1915), pp. LI-LII. 原文如次：“cesse d'employer son autorité à faire rappeler les Jésuites français de Pékin et de détruire une oeuvre si pieuse, qui a coûté tant de soins, de temps et d'argent”.

102 1773年7月21日，教皇簽署了解散耶穌會的通諭，同年8月16日公佈。耶穌會與耶穌會的檔案被收走，財產充公。1814年教皇庇護七世（Pie VII, 1800-1823）下詔恢復耶穌會，但直到1842年耶穌會士才再度進入中國。詳 Henri Cordier,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eking,” *T'oung Pao*, second séries, 17:3 (jul. 1916), pp. 271-347; 4/5

的大臣貝赫當不忍見法國政府近一個世紀努力經營的傳教、貿易、科學技術考察政策因此中斷，以私人財力資助仍停留於乾隆宮中的耶穌會士，並與之維持頻繁的書信往來¹⁰³。由於當時的法國政府亦面臨內政和社會等種種問題，因此貝赫當和內政大臣圖爾格希望藉由對中國文化、政治、制度等的全面考察，蒐集有助於擬定針砭法國困境的策略所需之元素。1765年，亦即耶穌會士被法王路易十五驅逐的翌年，兩位來自北京的年輕教士高類思（Louis Ko [Gao]）和楊德望（Étienne Yang，出生於1733）帶著圖爾格的五十二條問卷啟程返華。被稱為「圖爾格的中國人」的這兩名中國教友於1751年7月被北京的耶穌會士送到法國習教，1754年初抵達法國，旋即進入薩赫特省（Sarthe）的皇家弗雷敘中學（Collège royale de la Flèche），接受將近六年的教育後才被送到巴黎，在此他們被安排接受貝爾當和圖爾格兩位內政大臣提供的基礎科學和技術的訓練；返華前還安排他們實地參觀了一些手工作坊—如里昂的絲織作坊，以了解工藝製作的程序。諸多準備均為了讓高類思和楊德望為法國提供中國經濟、制度和技術的詳細訊息。

耶穌會被解散後，滯留北京的耶穌會士雖然在貝赫當的支持下繼續考察工作的進行，然而自清初多次禁教之後，耶穌會士在華的活動範圍亦大幅縮小，或轉為地下化¹⁰⁴，而外放傳教士又側重在華傳教的工作。隨著最後一位留駐清朝內廷耶穌會士的離世以及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法國舊制度下王室與清廷間的

(oct. – dec. 1916), pp. 561-623; 1918年 Brill 出版抽印本。

- 103 耶穌會被解散時，北京的耶穌會士尚有；蔣友仁（Michel Benoist, 1715-1774, 1744年抵澳）、錢德明、方守義（Dollières, Jacques François Dieudonné d'Ollières, 1722-1780, 與韓國英同於1758抵澳）、韓國英、汪達洪（Jean-Mathieu Tournu de Ventavon, 1733-1787）、晁俊秀（François Bourgeois, 1723-1792）、金濟時（Collas, 1735-1781）、梁棟村（Jean Baptiste Joseph de Grammont, 1736-1812?, 1768到京）、賀清泰（Louis de Poirot, 1735-1813, 1770抵達廣州）、潘廷璋（Giuseppe Panzi, 1734-av. 1812, 1771抵中）等人（Henri Cordier,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eking,” pp. 282-283.）高第論述中部分耶穌會士的生平介紹與榮振華的專書有出入者，以後者為依據。
- 104 清廷禁教後，一些耶穌會士藏身內陸省份（如四川等）繼續傳教，並受到教友的掩護。可參考秦和平，〈清代四川天主教傳教史拾遺（一）〉，《西南民族學院學報》，2（成都：1998.04），頁86-93。秦和平，〈清代四川天主教傳教史拾遺（二）〉，《西南民族學院學報》，5（成都：1998.10），頁115-119。秦和平，〈清代四川天主教傳教史拾遺（三）〉，《西南民族學院學報》，3（成都：1998.05），頁51-54。秦和平，〈清代四川天主教傳教史拾遺（四）〉，《西南民族學院學報》，S3（成都：1998.08），頁225-233。韋羽，《18世紀天主教在四川的傳播》（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以及賓靜的博士論文，〈清代禁教時期華籍天主教徒的傳教活動研究（1721-1846）〉（廣州：暨南大學歷史學博士論文，2007）。

「官方」文化、科學技術交流亦隨之中斷。不過，十九世紀上半葉，法國仍多次派遣人員秘密潛入中國境內蒐集所需的訊息與資料¹⁰⁵。

五、法國在華的調研

上文提及，十七世紀末，法國政府派遣耶穌會士到中國，藉以建立與清廷的貿易關係，並獲得有助提升農工商業發展的知識與技術等有用的訊息，法國耶穌會士在亞洲和中國的科學技術考察主要回應在此前提下草擬的問卷，以及之後科學院士、萊布尼茲和圖爾格等人陸續向在華耶穌會士提出的多份問卷與問題，內容涵蓋中國和亞洲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制度、軍事、風俗、道德、信仰、農業、科學、技術、物產、手工業生產、消費習慣和市場等諸多面向。

有關中西交流的研究中，學者們一般將焦點置於透過耶穌會士完成的豐碩成果。不可否認地，耶穌會士在中西間的文化、科學、技術交流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法國東印度公司和海事部人員（船長、海員等）、外交人員、其他修會的傳教士，甚至中國的天主教徒等，均投入實地考察和資料蒐集、傳送的工作中，或一旁提供協助。在此長達一個多世紀，耗費龐大人力、物力與資源的傳教、貿易、科技考察活動中，法國雖然並未立即達到建立與清朝貿易關係的目標，然而從中國引進的諸多訊息與資料，如商品、書籍、圖像、輿圖、工具、模型、樣本、種子等等，對於其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農工商業技術的提升，科學與技術的發展——特別是農業、蠶桑絲綢業等——以及日後法國遠東勢力的擴張和貿易的開展，均有深遠的影響與意義。

在法國耶穌會士主導的、涉及範圍廣泛的調研成果中，輿圖的繪製以及地

105 1830年代，法國商業部長派遣葉倍赫（Louis Hébert，1839年在菲律賓去世）到東方蒐集「中國人[生產生絲]的方法」以及中國的桑種和蠶種，以推進法國的蠶桑絲業（Mau Chuan-hui, “Les enquêtes d’Isidore Hedde sur l’industrie chinoise de la soie,” in Mau Chuan-hui, Pierre-Étienne Will, *Missions au pays de la soie: l’ambassade Lagrené en Chine (1843-1846) entre science, commerce et diplomatie*, (Paris: Ed. Collège de France, coll. IHEC, 2017), pp. 153-205.)。

理知識的建立是相當重要的一個領域。如前文所述，正是在中國進行地理實測的迫切需要與渴望，促使法國國王和科學院院士們支持法國派遣耶穌會士派遣。與此同時，對於輿圖繪製早有關注的康熙皇帝，也在耶穌會士的循循勸誘下，切身感到使用歐洲輿圖測繪技術繪製中國輿圖的重要性，而要求耶穌會士返回歐洲挑選更多精通天文、地理和數學的教士前來中國。康熙二十八年（1689），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乘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之便，沿途測繪當時尚未經過丈量而在中國輿圖上呈現空白的東北地區，並將之上呈清聖祖，使其體認到輿圖繪測的重要性¹⁰⁶；三十七年（1698）巴多明「來華傳教，細察各省地理，見府縣城鎮座落之處，多有不合綫度者」¹⁰⁷，使康熙迫切感到輿圖測繪的必要性，因命白晉返回歐洲，挑選精通天文、地理和數學的傳教士來華¹⁰⁸。六年後，康熙下詔進行全國的地理測量，由法國耶穌會士主持，訓練勘測人員，並分組前往全國各地進行實測¹⁰⁹。康熙五十六年（1717）出版木刻的《皇輿全覽圖》，滿文的銅板輿圖也於兩年後問世¹¹⁰。耶穌會士亦將繪測的數據和蒐集的中國地圖送回法國（圖九），由路易十四的「國王的地理學師」（géographe du roi）唐維爾（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或 Danville, 1697-1782）繪製成中國全圖和分省地圖，出版於杜赫德的《大中華帝國志》中。1737 年荷蘭的出版商更將之結集成冊，獨立發行地圖集《中國新圖冊》（*Nouvelle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¹¹¹。耶穌會士的地理測量與輿圖繪製不僅有助於中國輿圖的精確與完

106 Yves de Thomaz de Boissière,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S.J. (1654-1707): mathématicien de Louis XIV, premier Supérieur général de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Chine.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K.U. Leuven, 1994), ch. 2. (辛岩、陳志雄譯，《耶穌會士張誠：路易十四派往中國的五位數學家之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第二章，特別是第 23 頁）。

107 樊國梁，《燕京開教略》，救世堂清刻本，中篇，頁 60，收入周燮藩、王美秀編，《東傳福音》（合肥：黃山書社，第六冊，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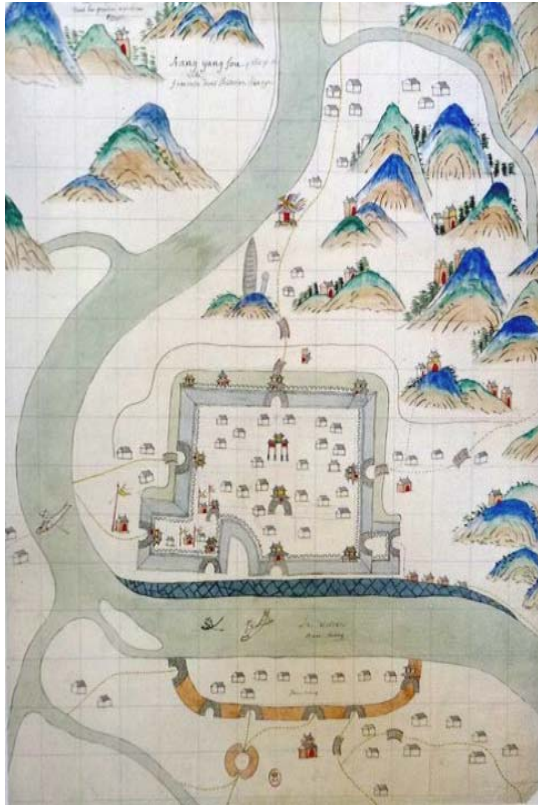
108 白晉於 1693 年離京，1697 年初抵法，1699 年帶回十位特選教士返華。方豪，《天主教人物傳》，頁 279；Joseph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pp.33-34。

109 秦國經利用奏摺的爬梳，在其論文〈18 世紀西洋人在測繪清朝輿圖中的活動與貢獻〉（《清史研究》，頁 37-44）中，對康熙四十七至五十七年間，負責不同地區測繪的傳教士和測量時間做了簡潔、清楚的整理與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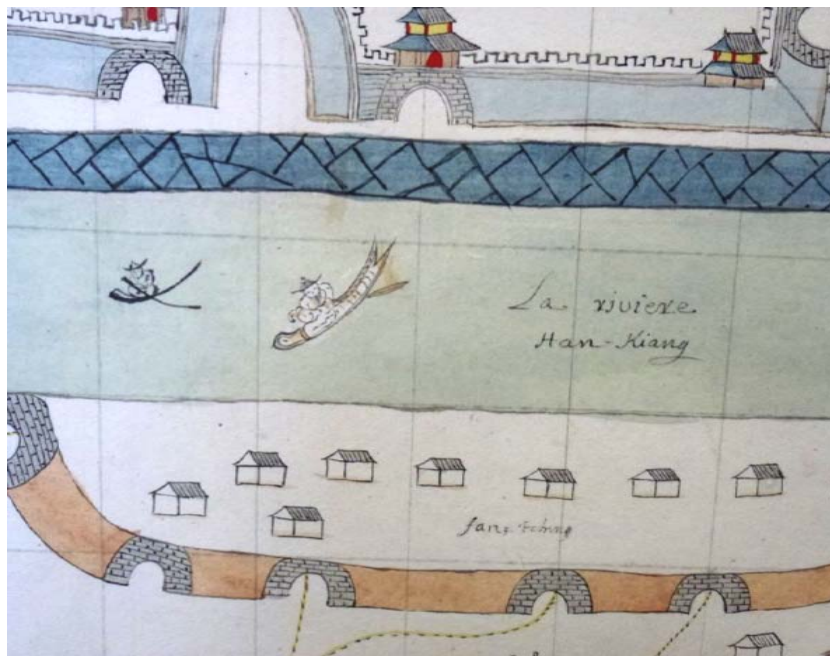
110 相關論述頗多，可參考李孝聰，〈記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及其版本〉，《故宮學術季刊》，30：1（臺北：2012.09），頁 55-85，特別是頁 77-78。

111 汪前進〈代序〉對清初繪測作精簡的說明；汪前進、劉若芳，《清廷三大實測全集》（北京：外文出版社，2005）。

善，更提供繪製世界地圖所需的有關中國地區的數據，因此得以精確計算地球直徑並修正法國地圖。



圖九、耶穌會士在中國蒐集用以出版在杜赫德《大中華帝國志》(t. 2, p. 200) 的〈襄陽府〉(Siang Yang fou) 地圖 (BnF, cabinet d'estampes, 毛傳慧翻拍 2017 年 7 月)



細節：地圖下半部中央，漢江 (La riviere Han-Kiang)

值得關注的是，法國輿圖的發展實際上是建立在不同文化的輿圖傳統之上的。除了耶穌會士的實測和輿圖蒐集以外，法國政府、商會和航海家為發展海洋貿易、遠洋航行的需要，以及對世界地理、人文的好奇，長期以來不斷透過各種管道大量蒐集海圖和相關的航海訊息，並將歐洲各國航海探險家的遊記，以及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長的紀錄譯成法文出版¹¹²。此外，海事部和東印度公司的船隻在前往遠東或全球航行時，亦遵循傳統，沿途進行測繪和水文勘測，紀錄詳細的航海日記，作為輿圖繪製師統整、繪製輿圖的依據。

美國史學家孔維茲 (Josef W. Konvitz) 在研究自 1660 年起法國近兩個世紀的輿圖史後認為：1660 至 1690 年間，法國不論在地理知識方面，或輿圖繪製技術上均出現飛躍式的進步¹¹³。文藝復興時期以來的三角測量 (triangulation) 和對數 (logarithms) 的發展與完善，以及與其他歐洲國家的合作，為法國的輿圖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助力。而此時期主要為科羅貝輔佐路易十四的時期。為提升天文學與輿圖繪製的知識與技術，法國以優渥的條件吸引著名意籍天文學家卡西尼前往巴黎、創設法國天文台。為發展遠洋貿易的需要和對地理知識的好奇，法國政府和地理愛好者大量蒐集世界各地的輿圖和海圖；此外，法國科學院和天文台、海事部以及東印度公司的船員在世界各地進行的實地丈量、測繪，均對法國的輿圖學發展做出相當大的貢獻。接受清朝皇帝委託到中國各地進行實測工作的法國耶穌會士，也因此得以親赴中國各地遊歷，藉此機會傳教，同時進行實地觀察，紀錄各地的自然環境、人文、風俗、物產和生產技術。耶穌會士交

112 大航海時代早期，雖然葡、西兩國將珍貴的航海訊息和海圖視為機密，嚴禁海圖的外傳，但仍有為數不少的海圖流入坊間。十七世紀末，荷蘭脫離西班牙的統治，開始印行大量的遊記和海圖，並蔚為風潮，成為上層社會的奢侈品。法國亦將當時流傳的各種歐洲相關文獻翻譯為法文，如 1683 年國王的圖書管理員泰伏諾 (Melchisédec Thévenot, 1620-1692) 將原文為法、西、德、葡、英、荷、波斯、阿拉伯和其他東方語文的遊記匯集起來，並翻譯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泰伏諾去世後，1696 年出現了增加數本新遊記的新版本：*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 qui n'ont point esté publiées et qu'on a traduit ou tiré des originaux des voyageurs Français, Espagnols, Allemands, Portugais, Anglois, Hollandois, Persans, Arabes & autres Orientaux, données au public par les soins de feu M. Melchisedec Thevenot*，並於 1672 年再版。部分法國蒐藏的亞洲海圖和中國地圖典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大部分已數位化可於網站查閱、下載 (<http://heritage.bnf.fr/france-chine/fr/cartographe>)。

113 Josef W. Konvitz, *Cartography in France 1660-1848,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statecraft*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p. xi-xvii.

往的對象亦由紫禁城內的皇帝、皇室成員、朝臣、士大夫與掌管御花園、造辦處的園丁、藝匠，擴及地方的官員、仕紳和平民百姓。

自明末葡萄牙耶穌會士遵循利瑪竇規矩傳教開始，中國的信徒快速增加，全國各地均形成龐大的教區。許多傳教士長期居留於中國各行省，不僅對地方的歷史、風俗、文化有深入的觀察與了解，且對地方上的手工業也有徹底的考察。出生於法國陶瓷重鎮—里摩日（Limoges）的殷弘緒（François-Xavier Dentrecolles 或 d'Entrecolles, 1664-1741）曾在景德鎮的教區長期停留，對陶瓷的製作工序進行實地觀察¹¹⁴。杜赫德將其 1712 年寄回法國的描述陶瓷生產工序的書信，收入其《大中華帝國志》中。此外，傳教士與許多中國信徒之間亦建立非常堅定的信任與深厚的關係：明末清初多次禁教，天主教社群在教難期間均提供歐洲傳教士非常有力的保護與協助，對於傳教士的在華調研亦給予相當大的協助。

中國植物的引進法國和馴化亦是耶穌會士較為顯著的成就之一。1741 年抵達北京的植物學家湯執中曾擔任清宮御花園的總管（directeur des Jardins impériaux），經常在京城內或近畿地區訪視，與當地的花農、藝匠，以及御花園的園丁交換植物種子，並討論、請教種植方法、用途與製作方法¹¹⁵。1750 年，湯執中被提名為巴黎科學院的通訊會員，與科學院植物學院士茹西鄂（Bernard de Jussieu, 1699-1777）書信往來，將種子、植物標本、塗繪，以及豐富的資料寄回法國。位於巴黎薩斯納河畔的植物園（Jardin des plantes）內，至今仍矗立著十八世紀自中國引進的黃槐（*Sophora japonica*）和白桑，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現今仍典藏著當時製作的植物標本。蠶桑絲綢和紡織手工業為十八世紀法國積極發展的手工業項目之一，多位耶穌會士曾嘗試將纖維作物和

114 殷弘緒於 1698 年與傅聖澤（François Fouquet, 1665-1741）等傳教士同行，自路易港出發，於次年 7 月抵達廈門，進入耶穌會中華行省江西分會，在南昌、饒州、景德鎮、九江等地停留多年。1719 年底抵達北京，直至 1741 年去世該地為止（Joseph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80*, pp. 73-74）。有關殷弘緒的傳記，可參考 Isabelle de Thomaz de Bossière, *François-Xavier Dentrecolles (Yin Hong-Siu Ki-Tsong) et l'apport de la Chine à l'Europe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82)。

115 更多實例可參考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冊，頁 794-798。及杜木蘭的博士論文（*L'introduction et l'acclimatation des plantes chinoises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其中，作者對在華耶穌會士對中國植物的觀察、種子的蒐集和寄送等均有細緻的分析與探討。

染料植物引進法國。湯執中還根據在中國蒐集的與野蠶放養相關的知識，在市場上購買蠶種親自實驗，然後將野蠶絲生產和製作程序的報告和野蠶寄食的植物種子寄回法國，試圖將野蠶絲的生產手工業引進法國（圖十）¹¹⁶。



圖十、傳教士寄回法國描繪野蠶放養工序的圖像（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de Lyon）

116 十八世紀中葉，湯執中曾將小藍的種子寄回法國，並在「國王的花園」中栽種成功。1786年的《中國回憶錄》刊載了有關藍色染料的說明介紹（MCC, “Préparation du petit indigo,” t. XI, pp. 73-77）；1743年，湯執中將放養山蠶的臭椿（*Ailanthus galantulosa* Desf.）種子寄回法國進行馴化與分類。有關野蠶放養在法國的引進與發展，可參考筆者的論文：Mau Chuan-hui, “Marché et nouvelle matière textile: la recherche de vers séricigènes sauvages en Chine et en France 市場與新的織品原料：中國與法國對於野蠶的研究,” in Pilar Gonzalez-Bernaldo, Liliane Perez (éds), *Les savoirs-mondes, mobilités et circulation des savoirs depuis le Moyen Age*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pp. 235-249。

傳教士們竭盡所能蒐集的書籍、圖像、報告、樣品、工具、模型和動植物標本、種子等資料，部分於返歐時隨行攜回，或藉由法國和其他東印度公司的協助，寄回法國或歐洲相關研究單位或人員手中，作為研究、實驗、分析和馴化栽培之用。法國國家工藝學院博物館庫房（Réserve du musée du 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s）即藏有法國大革命以後，由從科學院移來的、來自中國的工藝品、工具、模型和樣品¹¹⁷；賽佛爾國家陶瓷工場（Manufacture nationale de Sèvres）則擁有豐富的瓷器藏品以及與瓷器製作相關的檔案。

此外，法國東印度公司的船長、船員，或探險家亦趁海洋貿易之便，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進行考察，其中最著名的當為 1748 年至 1757 年間擔任東印度公司船務主任的皮耶·鄱佛（Pierre Poivre, 1719-1786）。他在 1754 年被推選為科學院通訊員，對於中國和東南亞的農業、紡織製造技術、染色植物與染色的工序特別感興趣，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和東南亞進行農業生產和技術的觀察，並蒐集植物種子和相關知識（種植方式、所需環境條件、用途及使用方法等），以便引進法國殖民地或法國本土，鄱佛還出版了遊記和旅行的回憶錄¹¹⁸。身為東印度公司的船務主任，鄱佛對於東南亞的自然資源和物產特別關注。為了建立友好的商業關係，還掌握了該地區各個國王的喜好，對於法國在東印度貿易的拓展，以及自然史知識的擴充均有相當大的貢獻。鄱佛退休後在其里昂郊區的私人宅邸進行外來植物的馴化，具體反映啟蒙時期法國對東方的好奇，且對法國外來植物的引進和農業、手工業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幫助。

值得玩味的是：法國對中國歷史、文化、制度、科學、技術、藝術的研究，

117 科學院的工具和模型原作為教學或示範之用，器具磨損後即送出銷毀。在庫房的隨手登記（main courante）中可查詢十八世紀來自中國的器具與模型的記錄。可惜大部分均因毀損、銷毀而無法調閱。

118 里昂科學院檔案館（Archives de l'Académie de Lyon）和里昂自然科學博物館附屬圖書館（Bibliothèque du Musée d'Histoire Naturelle）中有多個鄱佛捐贈的紀錄；部分鄱佛的旅行回憶錄也已出版：如 *Voyage d'un philosophe ou observations sur les moeurs et les arts des peuples de l'Afrique, de l'Asie et de l'Amérique* 哲學家遊記，又作：關於非洲、亞洲和美洲人民的風俗和工藝的觀察（Yverdon, 1768）；*Voyage de Pierre Poivre de 1748 jusqu'à 1757* 1748 至 1757 年間皮耶·鄱佛的遊記（Paris: Librairie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1918）；Louis Malleret, *Les mémoires d'un voyageur: un manuscrit inédit de Pierre Poivre* 一個旅者的回憶錄：皮耶·鄱佛未刊登的手稿（Paris: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68），pp. 1-10。

卻是在耶穌會被解散、北京耶穌會士凋零的十八世紀末開始進入更為深化而全面的階段。法國舊制度晚期，圖爾格、魁奈 (François Quesney, 1694-1774) 等重農學派人士參考中國的制度與經驗，積極發展法國的農、桑業和糧食儲藏系統。波旁復辟時期 (Restauration, 1814-1830)，在東方學家和漢學家的協助下，許多典藏於法國的中文文獻被大量翻譯成法文，提供學者們試驗的依據。博威 (Camille Beauvais, ca 1781-1852)¹¹⁹ 獲得查理十世 (Charles X, 1824-1830 在位) 的支持贊助，在巴黎近郊塞納—馬恩省的試驗農場「榭拿赫牧羊場」(bergeries de Sénart, Seine et Marne) 進行蠶桑試驗，即為最顯著的例子。博威根據耶穌會士摘錄翻譯的中國蠶桑文獻，建立蠶室、進行桑樹培育與育蠶實驗，同時借助當時先進的科學儀器 (溫度計、濕度計等) 進行觀察與量化的紀錄，對家蠶的認識與養蠶的技術有突破性的發展，進而形成超越意大利學派的《法國蠶學學派》(école française de la sériciculture)，並於法國各地成立模範蠶室 (magnanerie modèle) 進行蠶桑技術推廣。由於試驗卓有成效，博威建議法國政府將境內所藏的相關文獻翻譯成法文。當時擔任法蘭西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漢學席位的茹蓮 (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¹²⁰ 接受政府委託，於 1837 年出版了《桑蠶輯要》(*Résumé des principaux traités chinois sur la culture des mûriers et l'éducation des vers à soie*,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一書¹²¹。茹蓮還翻譯了許多有關陶瓷、造紙印刷和中國傳統手工業的相關文獻¹²²。

1844 年，拉萼尼 (Théodose de Lagrené, 1800-1862) 擔任法國大使暨全權代表來華簽訂中法條約時，體認到基督宗教對中法貿易和文化、科技交流的重要性，再加上其他的考量，特別在條約中加入有關基督宗教在通商口岸設立教堂和傳教自由的相關條文。而曾在使團中擔任拉萼尼秘書的敏體呢 (Charles de Montigny,

119 Sylvanus Urban, *Gentleman's magazine*, new series, vol. xxxviii, 1852, p. 319.

120 法蘭西學院漢學席位創設於 1814 年，由雷暮沙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 為首任教席。茹蓮為雷暮沙弟子。

121 有關中法間的蠶桑絲織技術交流，可參考筆者的相關論文，詳參考書目。

122 如《景德鎮陶錄》*Histoire et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 chinoise* (Paris: Mallet-Bachelier, 1856)、*Industri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de l'empire chinois, d'après des notices traduites du chinois par M. Stanislas Julien, et accompagnées de notices industrielles et scientifiques par M. Paul Champion* 中華帝國的古今手工業，茹蓮作注、翻譯，香皮庸的工業與科學注解 (Paris: E. Lacroix, 1869) 等。

1805-1868)¹²³，在訪華期間切身感受到中國基督宗教社群的重要性，在他擔任第一任上海領事期間，有規劃地積極動員各教區的神職人員和中國教友，繼續協助在華物產、技術等訊息的蒐集，並試圖透過織品樣品的展示，讓中國基督宗教社群訂購法國織品，以推動中法間的貿易¹²⁴。十九世紀中葉，法國蠶桑業受微粒子病（la pébrine）感染並迅速擴及整個歐洲和西亞、中亞，華絲遂成為法國絲綢業賴以生存的原料來源。中國生絲的對法外銷成為十九世紀下半葉中法貿易迅速發展的主要商品之一¹²⁵。

結語

近代早期是法國躍居歐洲強權之列的轉折時期，恰好也是歐洲自大航海時期以來受到來自東方的豐富物產、精美手工藝品，以及大量呈現東方—特別是中國—富庶安定圖像和敘述的吸引，蔚然形成「東方熱」，進而於十七世紀發展為「中國熱」的重要時期。中國無論在政治、經濟、制度，或是手工業、藝術等方面，均為當時歐洲各國仿效的模範，歐洲人士對來自東方和中國的訊息趨之若鶩。

在大航海時期早期，法國由於長期戰爭和經濟、技術不足等種種原因而被阻擋於東印度貿易圈之外，經過波旁王朝數位君主的努力，在國家經濟、財政、文化、科學、藝術與技術各方面均有明顯的提升。十六世紀晚期，葡萄牙王室

123 有關敏體呢的事蹟可參閱 Jean Fredet, *Quand la Chine s'ouvrait: Charles de Montigny, consul de France* 當中國對外開放：敏體呢，法國領事 (Paris: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1953, 1^{re} éd., Shanghai: imprimerie de T'ou-sè-wè, 1943)。

124 敏體呢的努力終因交通因素、以樣品編碼訂購與中國傳統購買和消費模式不符，以及諸多與法國外交人員和織品作坊的協調困難而告失敗。Mau Chuan-hui, "La mission en Chine de Lagrené et sa signification 拉萼尼訪華使團及其意涵," in Mau Chuan-hui, Pierre-Etienne Will (eds), *Missions au pays de la soie: l'ambassade Lagrené en Chine (1843-1846), entre science, commerce et diplomatie*, (Paris: Ed. Collège de France, coll. IHEC), pp. 59-105。

125 有關中法第一個條約—黃埔條約的簽訂，以及派遣來華簽約使團的組成、任務與在華調研的研究，請參閱毛傳慧 (Mau Chuan-hui) 和魏丕信 (Pierre-Étienne Will) 合編的 *Missions au pays de la soie: l'ambassade Lagrené en Chine (1843-1846) entre science, commerce et diplomatie* (Paris: Ed. Collège de France, coll. IHEC, 2017.) 一書。

因財政限制無力繼續提供耶穌會傳教事業的贊助，而給予法國派遣「國王的數學家」進入清朝宮廷的良機。在參考西、葡、英、荷等歐洲海上強權國家的先例後，醞釀形成「傳教、貿易、科技考察」的政策：藉由康熙皇帝對耶穌會士科學與技術的喜愛與需要，派遣傳教士到中國宣傳教義，希望獲得與大清國通商的特權、建立貿易關係，同時在中國境內實地考察，蒐集有助於法國農業、手工業和藝術等領域發展的相關資料與訊息。雖然此政策的推行並未在建立與發展中法貿易上獲得理想的成果，然而傳教士們在葡萄牙耶穌會士的基礎上，幾乎在中國各行省均建立教區，更重要的是透過傳教士—主要是耶穌會士傳送到歐洲的豐富訊息，提供啟蒙時期法國和歐洲菁英分析與借鏡的資料，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哲學等人文領域，或是輿圖繪製、農業、植物學、昆蟲學、蠶桑絲綢業、紡織業、陶瓷手工業等科學、技術與藝術的面向，均有明顯的提升與突破。對於歐洲的現代化有深遠的影響。

然而法國內部的政治紛爭、各階層間的對立與宗教衝突；在華耶穌會士、傳教士和東印度公司等群體的內部矛盾，使得法國政府投入龐大財力、人力與物力的傳教、貿易、科技考察政策，在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努力後，卻無法在法國發揮更大的作用，反而讓其他歐洲國家坐享其成，為法國的工商業製造強勁的競爭對手。近代東西方的交流與衝突雖然吸引許多學者的探討，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對法國和歐洲的影響，以及關注歐洲對中國科學、技術與藝術影響的研究成果頗豐，然而仍有許多值得深入觀察分析的議題，特別是現今有更多新史料的出現，以及數位化的發展方便學者們取得更豐富的資料進行對照分析。若將法國透過傳教、貿易、科技考察策略的執行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與十九世紀清朝的洋務運動（或稱自強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的「殖產興業」作一對照觀察，相信更可以凸顯出各國歷史文化的差異，同時勾勒出「全球化」的雛形。

十七世紀下半葉以降法國大批的航海人員（海員、探險家、海商等）和傳教士在遠東地區進行的全面考察和記載，為法國推動遠東地區的發展政策提供了寶貴的訊息；而當時在遠東地區進行的人文、地理觀察和紀錄，也為今日的史學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包括文獻和各類文物的史料，為東方史料的記載提供了補充與比較的珍貴材料。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中文

1. [清]允禔，《(乾隆)欽定大清會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61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2. [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2003。
5.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臺南：南市政府，1999-2010。
6.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臺北：聯經出版社，2000。
7. 樊國梁，《燕京開教略》，收入於周燮藩、王美秀主編，《東傳福音》，第六冊，合肥：黃山書社，2005。
8. 鐘鳴旦、杜鼎克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2。

西文

1. Álvaro Semedo, *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 da China*, 1642.
2. André abbé Morellet, *Mémoire sur la situation actuell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Paris: Chez Desaint, 1769.
3. Augustin de Beaulieu, *Mémoire d'un voyage aux Indes Orientales, 1619-1622*, Introduction, notes et bibliographie de Denys Lombard.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Maison neuve & Larose, 1996.
4. Charles Le Gobien, et al.,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de Chine,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mémoires de la Chine*. Toulouse: Imprimerie Noël-Etienne Sens et librairie Auguste Gaude, 1702-1776 (nouvelle édition: Paris: J.-G. Mériogot le Jeune, 1780-1783).
5. Charles Ralph 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53.
6. Chrétien-Louis Joseph de Guignes, *Voyage à Peking, Manille et l'île de France, faits dans l'intervalle des années 1784 à 1801*. Paris: l'imprimerie impériale, 1808.
7. Darrac, *Mémoire statistique des Établissements français en Asie*, Ms.
8. Dernis, *Recueil ou collection des titres, edits, declarations, arrets, réglemens et autres pieces concernant la companies des Indes orientales*.
9. Donald Ferguson, *Letters from Portuguese Captives in Canton, written in 1534-1536*. Charleston: Nabu press, 2012.
10. François-Mari Arouet Voltaire, *Siècle de Louis XIV, suivi de la liste raisonnée des personnages célèbres de son temps*. nouvelle édition annotée

par Charles Louandre, Paris: Charpentier, 1852.

11. François Froger, *Relation du premier voyage des Français à la Chine fait en 1698, 1699 et 1700 sur le vaisseau "L'amphitrite"*. hrsg. von E. A. Voretzsch, Leipzig, *Asia Major*, Leipzig, 1926.
12. François Pallu, *Relation abrégée des missions et des voyages des évêques François, envoyez aux Royaumes de la Chine, Cochinchine, Tonquin, & Siam*. Paris: Chez Denys Bechet, 1668.
13. François Pallu,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s missions et des évêques français vicaires apostoliques dans la Chine et dans les royaumes de l'Orient*. 1677.
14. François Pyrard de Laval, *Du voyage de François Pyrard de Laval*. Paris: chez Samuel Thiboust et Veuve Remy Dalin, 3rd ed., 1619.
15. Guy Tachard, *Voyage de Siam des pères jésuites envoyés par le Roi aux Indes & à la Chine*. Paris: chez Arnould Sencuze, Daniel Horthemels, 1686.
16. Henri Cordier, *La France en Chin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 documents inédits, publiés sur les manuscrits conservés au dépôt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avec une introduction et des notes*. Paris: Ernest Leroux, Editeur, 1883.
17. *Histoir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avec les mémoires de mathématiciens et de physique tirés des registres de cette Académie*.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 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 Anville , *Nouvelle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 contenant les cartes générales & particulières de ces pays, ainsi que la carte du royaume de Corée; la plupart levée sur les lieux par ordre de l'empereur Cang-Hi avec toute l'exactitude imaginable, soit par les PP. Jesuites missionnaires à la Chine, soit par des Tartares du tribunal des mathématiques, & toutes revûes par les mêmes peres*. La Haye, H. Scheurleer, 1737.
19. Jean-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nrichie des cartes générales et particulières de ces pays, de la carte générale et des cartes particulières du Thibet, & de la Corée, & ornée d'un grand nombre de figures & de vignettes gravées en taille douce*. Paris: J.-B. Mercier, 1735 (trans.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Chronological, Political and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Chinese-Tartary, Corea and Thibet*, London: J. Watts, 1741, 3rd ed.).
20. Jean-Baptiste Grosier,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Paris: 1777.
21. Juan Gonzáales de Mendoza, *Historia delas cosas mas nontables, ritos y costymbres*. Roma: 1585 (*The histories of the great and mightie kingdom of China*, R. Parke transl., London: Wolfe for Edward White, 1589).
22. Louis Le Comte, *Nouveau mémoire sur l'estat present de la Chine*. Paris: Chez Jean Anisson Directeur de l'Imprimerie Royale, 1697.
23. Matteo Ricci,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Augsburg: 1615.
24. Melchisédec Thévenot, *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 qui n'ont point este publiées et qu'on a traduit ou tiré des originaux des voyageurs*

Français, Espagnols, Allemands, Portugais, Anglois, Hollandois, Persans, Arabes & autres Orientaux, données au public par les soins de feu M. Melchisedec Thevenot

25.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 c.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Paris: Nyon, 1776-1814.
26. *Mémoires de mathématique et de physique, présentés à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par divers savants, et lus dans ses assemblés*.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27. Pierre Poivre, *Voyage d'un philosophe ou observations sur les mœurs et les arts des peuples de l'Afrique, de l'Asie et de l'Amérique*. Yverdon: 1768.
28. Pierre Poivre, *Voyage de Pierre Poivre de 1748 jusqu'à 1757*. Paris: Librairie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1918.
29. Saxe Bannister, transl., "The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to China, in 1698, 1699, and 1670," in François Froger,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to China, 1698-1700*. London: Thomas Cautley Newby, publisher, 1859.
30. Stanislas Julien, *Résumé des principaux traités chinois sur la culture des mûriers et l'éducation des vers à soie*.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37.
31. Stanislas Julien, *Histoire et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 chinoise*. Paris: Mallet-Bachelier, 1856.
32. Stanislas Julien, *Industri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de l'empire chinois, d'après des notices traduites du chinois par M. Stanislas Julien, et accompagnées de notices industrielles et scientifiques par M. Paul Champion*. Paris: E. Lacroix, 1869.
33. Sylvanus Urban, *Gentleman's magazine, new series*. London : 1852.
34. William C. Hunter, *Bits of Old China*.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Co., 1885.

二、譯著

1. 伊夫斯·德·托瑪斯·德·博西耶爾 (Yves de Thomaz de Boissière) 著，辛岩、陳志雄譯，《耶穌會士張誠：路易十四派往中國的五位數學家之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2. 利瑪竇 (Matteo Ricci) 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
3. 高必昂 (Charles Le Gobien) 著，沈堅、鄭德弟、呂一民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2005。
4. 孟德衛 (David E. Mungello) 著，江文君等譯，《1500-1800 年間中西方的偉大相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5. 唐那德·福開森 (Donald Ferguson) 著，何高濟譯，〈廣州葡囚書簡 (1524?) – 葡中首次交往的見證〉，《十六世紀葡萄牙文學中的中國中華帝國概述》，北京：中華書局，2013。
6. 馬士 (Hosea Ballou Morse) 著，區宗華、林樹惠譯，《東印度公司對

- 華貿易編年史 (1635-1834)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
7. 博克舍 (Charles Ralph Boxer) 著，何高濟譯，《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北京：中華書局，1990。
 8. 費莫·西蒙·伽士特拉 (Femme S. Gaastra) 著，倪文君譯，《荷蘭東印度公司》，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1。
 9. 費賴之 Louis Pfister 著，馮承鈞譯，《入華耶穌會士列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0。
 10. 藍莉 (Isabelle Landry-Deron) 著，許明龍譯，《請中國作證：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三、近代論著

中文

1. 方豪，《中國天主教人物傳》，香港：公教真理學會；臺中：光啟出版社，1970。
2. 方豪，《中西交通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3。
3. 李天綱，《中國禮儀之爭：歷史、禮儀和意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 汪前進、劉若芳，《清廷三大實測全集》，北京：外文出版社，2005。
5. 汪熙，《約翰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6. 韋羽，《18世紀天主教在四川的傳播》，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
7.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上海：上海書店，1989。
8. 陳方中、江國雄，《中梵外交關係史》，臺北：商務印書館，2003。
9. 張芝聯，《法國通史》，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0。
10.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臺北：聯經出版社，2000。
11. 潘吉星，《中外科學之交流》，香港：中文大學，1993。
12. 劉增泉，《法國史》，臺中：五南圖書出版社，2010。
13. 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上海：上海書局，1989。
14. 閻宗臨，《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西文

1. Belvitch-Stankevitch, "Le goût chinois en 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XIV". thèse de doctorat d'université à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Paris: Jouve et C^{ie}, 1910.
2. Camille de Rochemonteix, *Joseph Amiot, et les Derniers Survivants de la Mission Française à Pékin (1750-1795)*. Paris: Librairie Alphonse Picard et fils, 1915.
3. Catherine Jami, *The Emperor's New Mathematics. Western Learning and Imperial Authority During the Kangxi Reign (1662-172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4. Chuan-hui Mau, Will, Pierre-Étienne, eds, *Missions au pays de la soie* :

- l'ambassade Lagrené en Chine (1843-1846) entre science, commerce et diplomatie*. Paris: Ed. Collège de France, coll. IHEC, 2017/2018.
5. Claudius Madrolle, *Les premières voyages français à la Chine : la Compagnie de la Chine, 1698-1719*. Paris: Challamel, 1901.
 6. David E. Mungello,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
 7. Femme S. Gaastr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Zutphen: Walburg Pers, 2003.
 8. Henri Cordier, *Les origines des deux établissements dans l'Extrême-Orient : Chang-hai, Ning-po, documents inédits*. Paris: 1896.
 9. Henri Cordier, *La Mission Dubois de Jancigny dans l'Extrême-Orient (1841-1846)*. Paris: Librairie de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1916.
 10. Holden Furber, *Rival empires of trade in the Orient, 1600-180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6 (reprinted in *Maritime India*, New Delh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 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1929.
 12. Isabelle de Thomaz de Bossierre, *François-Xavier Dentreclles (Yin Hong-Siu Ki-Tsong) et l'apport de la Chine à l'Europe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82.
 13. Isabelle Landry-Deron, *La preuve par la Chine, La Description de J.-B. Du Halde, jésuite, 1735*. Paris: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02.
 14. Jean Fredet, *Quand la Chine s'ouvrait : Charles de Montigny, consul de France*. Paris: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1953 (1^{re} éd., Shanghai, imprimerie de T'ou-sè-wè, 1943).
 15. Jean Levot de Prosper, *Biographie bretonne. Recueil de notices sur tous les Bretons qui se sont fait un nom*. Vannes: Cauderan; Paris: Dumoulin, 1857.
 16. Josef W. Konvitz, *Cartography in France 1660-1848,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statecraft*.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17. Joseph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 Paris: Letouzey & Ané, 1973.
 18. Joseph Glenn Ames, Ronald S. Love, (eds), *Distant lands and diverse cultures : the French experience in Asia, 1600-1700*.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3.
 19. Kuo-tung Chen, *The Insolvency of the Chinese Merchants, 1760-1843*. Ph.D. thesi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90.
 20. Lewis A Ma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Texas: Paul Anderson Company, 1946.
 21. Louis Dermigny,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 Paris: S.E.V.P.E.N., 1964.
 22. Louis Malleret, *Les mémoires d'un voyageur : un manuscrit inédit de Pierre Poivre*, Paris: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68.

23. 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6.
24. Luce Boulnois, *La Route de la soie – Dieux, Guerriers et Marchands*, Geneva : Éd. Olizane, 2001. (trans. *Silk Road, Monks, Warriors & Merchants on the Silk Road*. Hong Kong: Odyssey Books & Guides, 2012).
25. M. Aymard , *Capitalisme hollandais et capitalisme mondial*. Paris: La Haye, Mouton, 1982.
26. Michela Fontana, *Matteo Ricci : A Jesuit in the Ming Cour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c., 2011.
27. 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 *Gravures des conquêtes de l'empereur de Chine K'ien-long au musée Guimet*. Paris: Publications du musée Guimet, 1969.
28. Musée d'Histoire de Nantes, *La soie et le Canon France-Chine, 1700-1800*. Paris: Gallimard, 2010.
29. Numa Broc, *Dictionnaire illustré des explorateurs français du XIXe siècle. II. Asie*. Paris: 1992.
30. Paul Kaepelin, *La Compagnie des Indes et François Marin, étude sur l'histoire du commerce et des établissements français dans l'Inde sous Louis XIV (1664-1719)*. Paris: Augustin Challamel, 1908.
31. Paul Kaepelin, *Les Escales françaises sur la route de l'Inde (1638-1731)*. Paris : Augustin Challamel, 1908.
32. Paul 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 Politics and Strategies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Trad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m 2011.
33. Philippe Haudrère, *Les Compagnies des Indes orientales, trois siècles de rencontre entre Orientaux et Occidentaux*. Paris: Desjonquères, 2006.
34. Pierre Clément, *Histoire de la vie et de l'administration de Colbert, contrôleur général des finances, précédée d'une étude historique sur Nicolas Fouquet*. Paris: Guillaumin, Libraire, 1846.
35. W. E. Cheong, *The Hong Merchants of Canton*. 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7.
36. Yves de Thomaz de Boissière,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S.J. (1654-1707) : mathématicien de Louis XIV, premier Supérieur général de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Chine*.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K.U. Leuven, 1994.

四、期刊論文

中文

1. 李孝聰，〈記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及其版本〉，《故宮學術季刊》，30：1（臺北：2012.09），頁 55-85。
2. 秦和平，〈清代四川天主教傳教史拾遺（一）〉，《西南民族學院學報》，2（成都：1998.04），頁 86-93。
3. 秦和平，〈清代四川天主教傳教史拾遺（二）〉，《西南民族學院學報》，5（成都：1998.10），頁 115-119。
4. 秦和平，〈清代四川天主教傳教史拾遺（三）〉，《西南民族學院學報》，3（成都：1998.05），頁 51-54。
5. 秦和平，〈清代四川天主教傳教史拾遺（四）〉，《西南民族學院學報》，S3（成都：1998.08），頁 225-233。
6. 秦國經，〈18 世紀西洋人在測繪清朝輿圖中的活動與貢獻〉，《清史研究》，1（北京：1997.01），頁 37-44。
7. 黃一農，〈瞿汝夔（太素）家世與生平考〉，《大陸雜誌》，85：5（臺北：1994），頁 1-3。

西文

1. Chuan-hui Mau, "Enquêtes françaises sur la sériciculture chinoise, fin XVII^e-fin XIX^e siècles," *Documents pour l'Histoire des Techniques*, Centre historique de documentation des techniques, nouvelle série n° 14 (2007), pp. 24-36.
2. Glenn Joseph Ames, "Colbert's Indian Ocean Strategy of 1664-1674: A Reappraisal,"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6:3 (1990), pp. 536-559.
3. Henri Cordier, "Les correspondants de Bertin, Secrétaire d'état au XVIII^e siècle,"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14:2 (1913), pp. 227-257; 14:4 (1913), pp. 465-472; 15:3 (1914), pp. 307-338; 16:1 (1915), pp. 27-60; 16:2 (1915), pp. 229-235; 18:4/5 (1917), pp. 295-379.
4. Henri Cordier,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eking".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17:3 (jul. 1916), pp. 271-347 ; 4/5 (oct. - dec. 1916), pp. 561-623.
5. Jacques Weber, "Les Comptoirs, la mer et l'Inde au temps des Compagnies," *Revue d'histoire maritime*, 1(1997), pp. 149-195.
6. Joseph Dehergne, "Une grande collection: 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 (1776-1814)," *Bulletin d'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72 (1983), pp. 267-298.
7. L. Aurousseau, "Henri Cordier (1849-1925),"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5 (1925), pp. 285-286.
8. Marion Bebout, "La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Histoire et perspectives," *Bulletin des bibliothèques de France*, Paris, 27:8 (1982), pp. 479-480.
9. P. Huard, and M. Wong, "Les enquêtes françaises sur la science et la

- technologie chinoises au XVIII^e siècle,”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53 (1966), pp. 137-202.
10. Paul 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avec la Chine. Le Premier voyage de l'*Amphitrite* en Chine,” *Journal des Savants*, (1928), pp.433-451 ; (1929), pp.110-125 ; pp. 252-267 ; pp. 289-298.
 11. Saxe Bannister, (trans), “The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to China, in 1698, 1699, and 1670,”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to China, 1698-1700*, translated from 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by Saxe Bannister, with an essay on the friendly disposi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to foreigners, London: Thomas Cautley Newby, publisher, 1859.

五、專書論文

1. Alexei Volkov, “On two maps of Vietnam by Alexandre de Rhodes,” in Luís Saraiva (eds), Catherine Jami, *Visual and textual representations in exchanges between Europe and East Asia, 16th – 18th century* (Singapore : World Scientific, 2018), pp. 99-117.
2. Chuan-hui Mau, “Les techniques séricicoles chinoises dans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sériciculture française de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au début du XIX^e siècle,” in Natacha Coquery and al. (éd.), *Artisans, industrie. Nouvelles révolutions du Moyen Âge à nos jours, Cahiers 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 n°52 (Lyon : ENS-Éditions / Société français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Techniques, 2012), pp. 409-420.
3. Chuan-hui Mau, “Marché et nouvelle matière textile : la recherche de vers séricigènes sauvages en Chine et en France”. in Pilar Gonzalez-Bernaldo, Liliane Perez (éds), *Les savoirs-mondes, mobilités et circulation des savoirs depuis le Moyen Age*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5), pp. 235-249.
4. Chuan-hui Mau, “La mission en Chine de Lagrené et sa signification,” in Will, Pierre-Etienne, and Chuan-hui Mau (eds.), *Missions au pays de la soie : l'ambassade Lagrené en Chine (1843-1846) entre science, commerce et diplomatie* (Paris: Ed. Collège de France, coll. IHEC, 2017), pp. 59-105.
5. Chuan-hui Mau, “Les enquêtes d'Isidore Hedde sur l'industrie chinoise de la soie, in Mau Chuan-hui, Pierre-Étienne Will (eds.), *Missions au pays de la soie : l'ambassade Lagrené en Chine (1843-1846) entre science, commerce et diplomatie* (Paris: Ed. Collège de France, coll. IHEC, 2017), pp. 153-205.
6. Michel Cartier, “Les relations franco-chinoises et la place de la soie dans le commerce des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in Mau Chuan- hui, Pierre-Étienne Will, (eds.), *Missions au pays de la soie: l'ambassade Lagrené en Chine (1843-1846) entre science, commerce et diplomatie*. (Paris: Ed. Collège de France, coll. IHEC, 2018), pp. 43-58.

六、學位論文

中文

1. 賓靜，〈清代禁教時期華籍天主教徒的傳教活動研究（1721-1846）〉，廣州：暨南大學歷史學博士論文，2007。

西文

1. Chuan- hui Mau, “L’industrie de la soie en France et en Chine de la fin du XVIII^e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 échanges technologiques, stylistiques et commerciaux”. Paris: thèse de doctorat non publiée de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02.
2. Dumoulin-Genest, Marie-Pierre, *L’introduction et l’acclimatation des plantes chinoises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thèse de doctorat non publiée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94.
3. Richard Sola, “Histoire de Consulat de France à Canton: 1824-1844”. Paris: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mémoire de D.R.E.A non publié, 1981.

七、網路資料

1. Archiv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 Ressources en ligne
http://www.academie-sciences.fr/archivage_site/activite/archive/ressource.htm
2. Archives nationales
<http://www.archives-nationales.culture.gouv.fr/fr/web/guest/salle-des-inventaires-virtuelle>
3. Bibliotheca sinica 2.0
<https://www.univie.ac.at/Geschichte/China-Bibliographie/blog/2010/06/10/memoires-concernant-les-chinois/>
4. Chine ancienne
<https://www.chineancienne.fr/17e-18e-s/memoires-concernant-les-chinois/>
5. South Asia – The British Library
<https://www.bl.uk/subjects/south-asia>
6. BnF Gallica 法國國家圖書館數位圖書館網站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1102726.image>
7. BnF Patrimoines partagés 法國國家圖書館共同的遺產
<http://heritage.bnf.fr/france-chine/fr/cartographier>

附錄：圖像、輿圖目錄

圖一

- a、《皇家運河全圖：為連結從土魯斯到塞特港的兩個海洋[地中海與大西洋]》
(*Carte générale du canal royale pour la communication des deux mers depuis Toulouse jusqu'au port de Cette*, BnF, Gallica)
- b、1837 年豎立於阿勒佐入水口 (prise d'eau d'Alzeau) 的紀念碑 (作者攝於 2017 年 7 月)

圖二、《拉瓦勒的皮哈河自 1601 年開始數年的航路圖》(*Carte Itinéraire de Pyrard de Laval, les Annees 1601 et suivantes*)

圖三、1751 年的印度半島地圖 (Charles Joppen, *Historical Atlas of India*)

圖四、廣州河出海口的島嶼，耶穌會 Dolcé 神父實地繪製 (*Carte des isles qui sont à l'entrée de la rivière de Canton, par le P. Dolcé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1698. BnF Gallica)

圖五、《暹羅王國及其鄰近國家地圖》，輿圖出版商杜·瓦勒 (Pierre Duval, 1619-1683) 題贈給脩孟騎士 (*Carte du royaume de Siam et des Pays circonvoisins*, par P. Du-Val, 1686, BnF Gallica)

圖六、桑松 (Nicola Sanson, 1600-1667) , *Galliae antiquae descriptio geographica* 古代高盧[法國]地圖，1627 (BnF Gallica)

圖七、耶穌會士受邀參觀科學院 (摘自 Guy Tachard, *Voyage de Siam des pères jésuites envoyés par le Roi aux Indes & à la Chine*, Paris: chez Arnould Sencuze, Daniel Horthemels, 1686, p. 1)

圖八、耶穌會士塔夏描寫暹羅風俗的插圖 (摘自 Guy Tachard, *Voyage de Siam*, p. 373.)

圖九、耶穌會士在中國蒐集用以出版在杜赫德《大中華帝國志》的〈襄陽府〉(Siang Yang fou) 地圖 (BnF, cabinet d'estampes, 毛傳慧翻拍於 2017 年 7 月)

圖十、傳教士寄回法國描繪野蠶放養工序的圖像手稿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de Lyon, ms.)

French Far-East trad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 an “evangelization, trade and investigation of sciences and techniques” policy

Chuan-Hui Mau*

Abstract

In the studies of pre-modern maritime history, the France is a relatively marginalized European country. Even though scholars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history of exchang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carried out through French Jesuits, only a relatively small number of historians worked on the attempts of French government to build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Qing court. These attempts, which were often conducted with the help of Catholic missionaries, included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vestigations in China aimed at collecting useful information for development of sciences, “national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is multifaceted activity of the missionaries is referred in the title of the present paper as “evangelization, trade and investigation of sciences and techniques”. More specifically, the paper examines the measures adopted by the French government during the pre-modern period in order to develop economics, sciences and foreign trade, and discusses the role of Jesuit missionaries in this process.

Key words: development of French-China relations, Jesuit missionaries in China, French East India Company, map making, French investigations in China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istory Institute.